

## 切实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 雨南

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这不仅是对年轻干部、也是对所有领导干部的殷切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蕴涵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体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既明方向、又讲方法；既生动深刻、又语重心长；既如沐春风、又醍醐灌顶；既深切厚爱、又殷切嘱托，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指导意义和时代意义。指明了新时代领导干部锤炼过硬本领、干事创业、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根本方向。

七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更是一个体系化、系统化的科学论断。七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纲”，体现了政治立场、政治站位、政治追求、政治担当、政治忠诚和政治纪律。政治是国之“大”者、“要”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政治能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握住政治之“大”、之“要”，才能面对当前的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化解风险挑战，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难题，在世事变幻中“乱云飞渡仍从容”，展示出坚定的政治自觉与自信。

## 目 次 CONTENTS

---

习 近 平  
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

张 多

上下联动：论新时代中国改革的  
双向合力 5

胡志远  
胡顺宇

机遇与挑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  
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路径选择 12

---

哲学政治学  
研 究

刘帅帅

论西方主流经济学逻辑支点的局  
限性 19

张志恒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德治与法治  
关系研究 24

---

党史党建  
论 坛

卜红双  
蒙静怡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加强党的思  
想建设研究 29

姚茂军

毛泽东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  
研究 36

---

---

## 社会与文化

- |     |                                    |    |
|-----|------------------------------------|----|
| 刘新伟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软实力<br>意蕴               | 41 |
| 胡厚翠 | 大数据时代下推进智慧社区建设<br>问题研究<br>——以合肥市为例 | 46 |
| 芦 升 | 区块链技术在解决智慧城市体系<br>架构中的应用           | 53 |

---

## 行政管理与 法 治

- |     |                     |    |
|-----|---------------------|----|
| 曹广宇 | 普法宣传举措创新及长效机制<br>研究 | 58 |
|-----|---------------------|----|
- 

### 声 明

来稿凡经本刊使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本刊及本刊合作媒体进行信息网络传播及发行，同时本刊所付稿费包括上述所有使用方式稿费。

# CONTENTS

5	Zhang Duo	Mechanism of the Upper and Lower Linkage: On the Two-way Synergy of China's Reform in New Era
12	Hu Zhiyuan Hu Shunyu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ath Choice of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t Politics in New Era
19	Liu Shuaishuai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Logical Supporting Point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24	Zhang Zhiheng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ule of Virtue and Rule of Law in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9	Bu Hongshuang Meng Jingyi	Research on Strengthening 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by Mao Zedong in Yan'an Period
36	Yao Maojun	Research on Mao Zedong's Thought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41	Liu Xinwei	The Implication of Cultural Soft Power in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46	Hu Houcui	Research 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Communiti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 Take Hefei as an example
53	Lu Sheng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Solution of Computer Architecture of Intelligent City
58	Cao Guangyu	Research on Innovation of Law Propaganda and Popularization Measures and Long-term Mechanism

# 上下联动：论新时代中国改革的双向合力

张多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环视古今中外，单向发力的改革模式有着难以规避的弊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形成的双向改革合力是创造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分析当代中国双向改革合力形成的理论逻辑、基本要素、协调机制等，不仅能够对中国的稳定发展做出有效解释，而且对于当前一些社会整体发力进行改革的国家也贡献了中国经验。

**关键词：**改革合力；中国经验；基本遵循；上下联动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83(2020)11-0005-07

新时代，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新的历史特点使各项改革的难度加大。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三次会议强调，要“注意解决执行中统一思想的问题，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可以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改革纵向维度上形成的双向合力是创造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分析当代中国双向改革合力形成的理论逻辑、基本要素、协调机制等，不仅能够对中国的稳定发展做

出有效解释，而且对于当前一些社会整体发力进行改革的国家也贡献了中国经验。

## 一、“单向发力”：两种改革模式的局限性

### (一) 自上而下改革的局限性

自上而下的改革部署往往与地方的具体情况不相匹配，且权威体制越是强化和刚性，越与解决实际问题的正确改革路径相去甚远。历史规律告诉我们，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具体国情的改革不过是空中楼阁，因为脱离实践，改革的决策者极易陷入经验主义、拿来主义的决策误区；而且为了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指令，基层则会用变通等方式应付上级。北宋时期，为了挽救出现的统治危机，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一场由上至下的全面改革。在此过程中，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缜密论证的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法令，依靠行政力量“一刀切”机械地统一执行，使各地官商根据法令的漏洞相互勾结，变相干扰和破坏了市场形态，反而增加了平民百姓的负担，这就是导致王安石历经17年改革终以失败收场的重要原因。

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会削弱公民参与改革的主动

**收稿日期：**2020-10-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内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5AKS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多（1991-），男，福建龙岩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动性。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显示出强烈的精英主义特征，决策者关注的焦点通常是全国性和全局性的大事。“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公共事物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此相关的事物。”<sup>[1]</sup>最关切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快速有效地回应，将会致使部分群众的改革热情走向弱化。另一方面，通过强制性手段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几乎完全由政府包办，使大部分民众被动、消极、盲目地参与改革行为，长此以往，“说了也白说”便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从而间接抑制了民间重要改革智慧的发挥。

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干扰。“自上而下”改革模式的运行逻辑可以看作是民众与政府达成的一种传统社会契约关系，即普通民众将权力委托给上层决策者代为在推动改革中使用。这一模式的局限在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信息、资源、权力的不对称，委托人没有办法检视到代理人的行为。代理人可能会违背人民的意愿，往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改革”，“占统治地位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sup>[2] 552</sup>，最终转变为利益集团。由于自我安全感和自我保护的需要，这些既得利益者会通过手中的权力将这些利益固化、合法化，进而阻碍改革，这也是为什么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自上而下的改革风险性危害往往大于渐进式的改革。古今中外任何改革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在风险可控范围内进行的改革创新才更加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否则，改革将成为一潭死水。但自上而下的改革范围广、强度大，一旦出现改革失误便是方向性、颠覆性的错误，现有的容错试错机制根本无法包容，纠错机制也无力改变。“在许多情形下，举国体制一以贯之的做法不仅代价高昂，难以为继，而且常常诱发重大灾难，如‘大跃进’和‘文革’”<sup>[3]</sup>。

## （二）自下而上改革的局限性

自下而上的单向改革模式往往导致改革效率低下。若没有一个顶层强大的组织力量凝聚共识领导改革，不注重相关领域改革的协同配合，而是任凭

地方与部门的“单兵突进”，这样低组织化的改革，一是会使各方面的改革措施毫无关联性和整体性，造成地方与部门之间的相互倾轧甚至是恶性竞争；二是会使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会暴露，原因就在于没有长远的改革目标使改革缺乏持续性。这些弊端严重影响了改革的效率。

自下而上的单向改革容易出现改革短板。此类型的改革往往由群众自发进行，公众普遍的自利心理会产生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短视性”改革效果。社会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从群体性的角度论证了公共理性的缺失，卡普兰的《理性选民的神话》一书则从大众和专家掌握相关知识程度不同这一角度论证了这一看法。尤其是物质利益激励，通常是此类改革推行的强大动力。片面、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增长主义”改革危害在于：迎合了民众的短期福利诉求，实际上损害的是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拉美国家失败的改革正是自下而上单向发力的典型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力求摆脱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控制的拉美国家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拉美国家对自由和快速发展的渴望为以美国人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没有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而是一味要求拉美国家进行“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改革，只注重效率，忽视了社会平等、公正、稳定的问题。新民粹主义为达到排除一切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致使拉美国家政府职能的弱化。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民众的游行、示威、罢工等“威胁”，最后演化成“对一个群体来说实现其需求最有效方式是比其他群体更具威胁性”<sup>[4]</sup>。拉美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不足，意味着社会不可避免地沦为亨廷顿所描述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普力夺”社会，最终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 二、“上下联动”：改革合力的协同机理

众所周知，在物理学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力是合力形成的充要条件，改革双向合力的形

成亦是如此。当任意两个力的方向越接近时,形成的合力越大;反之,两个力的作用方向相差越大甚至反向,则会对合力的形成产生阻碍作用。中国的改革踏入“后半程”,来自上下不同层面的改革力量需要整合成同一方向的定力,从而不断拓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只有厘清当代中国改革的双向合力要素,才能正确分析和考量社会作用力之间相互冲突与融合过程。

### (一) 基层探索的创新向度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同样,任何改革要上升为国家制度,都需要有理性化的实践作为基础。而基层社会是每个人日常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sup>[5]</sup>。中国的改革有相当一部分源自于民间、民营、体制外、计划外的变化,更多地表现为民间习惯、价值观念等非正式规则的先期改变。之后,再经由中央不断总结基层的成功经验,基于协调各方利益,最终设计生成制度。这一方法不纠缠于理论争论,而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富有中国智慧的方式为改革创新提供启发和思路,为通用性规则确定提供了经实践检验后的理论依据。基层的试点探索是中国改革最原始的动力,也是解决中国这样超大型国家发展不平衡格局的必要手段。当然,基层探索不仅仅需要勇气和胆识,更需要完善的容错机制和各个领域的简政放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改革试点工作的容错机制和深化简政放权高度重视并多次作出说明,间接使社会、市场、资本、技术更进一步释放活力和创造力。

“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sup>[6]</sup>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允许基层和民间做丰富的探索,然后再整合到具体的制度创新中去。“北京共识”的提出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曾指出,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就是:“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sup>[7]</sup>从基层先行的改革案例在中国大地不胜枚举,比如,2003年浙江省长兴县在全国率先探索实

行河长制,由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迫切需要,2016年中央深改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 (二) 顶层设计的整合向度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中央反复强调要从全局和局部相配合的角度考虑改革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同过去相比,中国的改革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扩展了。要把改革推向前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sup>[8]</sup>“顶层设计”(Top-Down Design)是一个从工程学术语借用到政策层面关于宏观战略设计的词汇,意指从顶层开始自上而下全面规划改革的实践过程,从而提高改革系统集成效应。

有学者将中国的顶层设计模式概括为“共识型决策”,这种决策模式有两大支柱保证设计的科学性:一是“开门”型参与结构;二是“磨合”型互动机制<sup>[9]</sup>。“开门”在政治学中称为“利益表达”。在我国,利益表达渠道由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信访等专门化机制以及社团、新闻媒体等非专门化机构组成。“磨合”在政治学中称为“利益整合”。当这些利益诉求输入到政治系统后,党和政府负责协商、管理这些改革的利益诉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某项改革决策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政协等国家政治中枢将与其它某一特定问题的相关部门协同进行大量、广泛的准备工作,比如调查研究、意见征询、政治动员等,最终才将人民群众的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制度设计。值得注意的是,在决策的全过程中,代表中国人民最广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委(党组)工作制度“嵌入”各种组织发挥领导作用,进行社会、国家、执政党三者的有效整合。因此,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制衡机制,中国的改革兼顾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后者则较为明显地反映某些集团的利益而忽视另一些集团的利益。

为防止出现央地博弈、各行其是、信息扭曲等情况出现,除了顶层设计还需要顶层推动。“高位推动”<sup>[10]</sup>是具有中国特色党主导下的制度运行机制。党具有严密的领导系统和严格的纪律,是中央

政令在全国有效得以贯彻实施的基本保障。贯彻落实某一重大改革，党会成立领导小组（还有诸多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与“领导小组”功能相似，如“工作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等）进行“归口管理”。一般来说，领导小组由权力层级较高的官员和部门牵头。透过这一机制，在纵向上，领导小组能够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在上下级之间扮演双方“传声筒”的角色；在横向上，起到减少各地之间执行摩擦成本的作用。这种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枢纽机制既有推动又有缓冲功能，是一般西方国家所欠缺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改革的“核心”确立后，改革的确定性也就越强。深改小组站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思考和研究问题，同时督促、推动顶层设计改革的落实。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上升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实现了由任务型组织向常规型组织转型，更加便于从顶层设计的体制机制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相比于领导小组，委员会的职能范围更加全面、机构设置进一步优化、参与成员更多元、统筹协调能力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各级“改革领导小组”与中央衔接更加紧密，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使改革运行更加稳定，减少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 （三）形成双向改革合力的技术策略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一套中央权威治理与地方有效自治紧密结合的“上”“下”联动机制，使二者之间保持良性张力，协同合作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正如有国外学者评价，“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正确道路在于自上而下的控制与自下而上的活力之间的均衡发展协调磨合。”<sup>[11]</sup>

从中国的人口和疆土规模等方面衡量，中国历来是中央统一领导的政治共同体。在当代中国，改革决策由中央层面透过层层落实、分解指标的压力型体制自上而下推动执行。有学者将这一体制形象地概括为“行政发包制”<sup>[12]</sup>，即中央向各级地方政府层层传达和部署具体目标或政策方向，“发包”给各级政府执行落实。与纯粹的科层制相比，因为

承包人（地方）拥有较大的剩余索取权和自由裁量权，所以承包人（地方）激励强度较高。此外，与多数国家“块块”实、“条条”虚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条条”和“块块”都“掌握中央精神”，分别通过自己的领导系统把这种中央精神传达、贯彻到地方和基层<sup>[13]</sup>。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进而摆脱改革过程中地方中心主义的困扰，使全国全党的改革目标、改革行动一致。这样跳出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充分体现了中国“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sup>[14]3</sup>。中央在后续的制度运行过程中行使监督权、控制权，检查各层级政府的各项工作与中央已定的原则、方向、计划是否符合。党的十八大以后，为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中央完善了重大事项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和巡视制度。当然，在有必要时上级会对下级进行指导与调整。

中央制订的改革决策只有落实到一定的地方场域，才能真正实现改革的目标和产生绩效。“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sup>[15]</sup>，并且“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sup>[14]18</sup>。根据这一方法，中国地方政府通过《宪法》《立法法》《地方方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授权，被赋予了一定的行政权、管理权、立法权等权责。1994年实行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为建立较为规范的横向财力均衡制度打下了基础。从实践来看，分税制有利于中央实现正常而合理的集权，同时它具有明确中央与地方事权范围和税收体系的特点，实际上也保障了地方经济的相对灵活性和自主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要求，“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sup>[14]18</sup>地方与中央事权、财权的划分，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改革中不是盲目、机械地一刀切去执行上级政策。若有必要的话，地方能够在改革的过程中通过谈判、反馈的机制使央地寻找利益结合点，增强双方共识，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三、理解形成改革双向合力的中国逻辑

恩格斯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sup>[16]</sup>同样,在新时代改革合力建构的实践中,只有立足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遵循改革的科学规律,才能继续坚持“上”“下”协同综合的改革机制,使一对看似互为对抗的反作用力为推进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同向发力。

(一) 深刻理解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角色定位,坚持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党领导改革是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决定的。新时代,继续坚持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正确理解和把握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角色定位,“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sup>[14]</sup><sup>8</sup>,事关改革合力的健康发展,事关改革奋斗目标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领者,能够确保合力方向和力度的正确性。改革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sup>[17]</sup><sup>15</sup>。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对改革进行整体谋划和协同推进,从而避免方向性、颠覆性的错误。若方向不清,再强大的合力也只会被错误的社会思潮、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别有用心舆论引入歧途、诱入误区。同时,改革的力度应当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之内,不能采取以“休克疗法”所代表的激进改革。改革可以试错,但要收的回来,这最能够证明党领导的权威性。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sup>[18]</sup>因此,自觉维护中央大政方针和改革方向的统一性、严肃性,是改革的基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者和督促

者,能够提升合力作用的有效性。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言必行,行必果”,很重要一点是中国具有稳定的“目标重塑”治理机制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势能”<sup>[19]</sup>。作为典型的“使命型”政党和长期执政的大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和持续推动改革的自觉性,可以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改革决策、提出改革目标,即把党的历届全会精神 and 五年规划作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改革任务书。在综合运用经济激励、政治引导、行政强制、法律约束、舆论推动的党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渗透机制下,各种国家机器都围绕着目标的实现被开动起来,各种资源围绕着目标实现的方向配置,从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合力,持续推动中国的改革向前发展<sup>[20]</sup>。然而,仅仅起推动作用是不够的。为防止地方和部门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中央通过上下贯通、层层负责的主体责任链条和“专门督察力量,做到改革推进到哪里、督察就跟进到哪里”<sup>[21]</sup>,进而保证改革的成效。

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利益协调者,能够激发合力主体的积极性。新时代的改革是惠及大多数人的改革,改革的焦点自然也从做大蛋糕逐渐转向分好蛋糕。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sup>[2]</sup><sup>286</sup>若利益分配欠缺合理性、社会秩序失衡,那么改革主体参与、支持改革的积极性便无法调动。中国共产党是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而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因追求自身特殊利益所造成的决策局限和动员困境,有效地防止市民社会兴起所带来的碎片化、分利化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党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妥善处理改革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尽可能地消解改革中的冲突和摩擦,使各个不同的社会主体间达成新的协调与平衡,产生出每一项改革和其他改革协同配合的效果。

(二) 正确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追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

“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

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sup>[22]</sup>人们创造着自己历史社会的发展就是无数单个意志相互作用形成主体合力的过程，而主体合力主要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作用。换言之，只有保障人民的改革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形成合力推动社会发展。微观层面，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中国改革的对象化、现实化的方式。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全面深化改革势必遇到众多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且这些利益问题大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23]</sup>。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sup>[8] 98</sup>，这既是主体意志合力论的内在要求，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旨归。

首先，要明确“为谁改革”的时代之问。改革不是使少数人受益，而是追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sup>[24]</sup>改革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红利”，而不是同苏联和东欧的改革一样，突出了权贵阶层和社会精英的利益。其次，要明确“靠谁改革”的时代之问。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利用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等工作方式，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以最大公约数的理念，聚合众力、融合众智，为改革提供强大而广泛的力量支持<sup>[25]</sup>。最后，要明确“怎样改革”的时代之问。人民是评价改革效果的主体。“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sup>[26]</sup>，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并积极参与改革。应该看到，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物质文化需要”已经转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们对改革的认同也从单纯的经济绩效认同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多方面的价值认同转

变。因此，必须通过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以达到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

(三) 重视法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

法治建设与改革的价值追求是有机统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开宗明义就提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sup>[27]</sup>。然而，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2014年）》分析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往往是强调先改革、后立法，强调改革可以突破法律法规的规定，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可以突破宪法的规定”。对于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sup>[17] 153</sup>。

首先，法治能够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当前社会转型风险因素增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矛盾激化。法治是最容易使冲突各方达成一致的方式，因为以法治思维思考和以法治方式规定程序可以阻隔对法外因素的过多考虑，特别是抑制人际关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主体对改革的公平性抱有较高的信心。同时，构建法治型国家也是全社会比较一致的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之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sup>[8] 145</sup>。运用合法性的论证和正当的程序出台改革政策，必要时举行听证，这样既符合法治的思维方式，尊重、说服持不同改革意见的主体，也能够规避治理风险，防止个体力量游离于整体力量之外。当然，这里作为改革依据的法不能刻板机械地理解为上对下的制定法，而是运用法治的灵活性、包容性、动态性来理解改革语境下广义的法。

另一方面，法治为全面深化改革合力的生成、作用的发挥提供保障。改革需要一定的权力、权威推动，但是不受管制、过分集中的权力容易使个别决策中产生“家长制”“一言堂”等现象，这样就无法留给其他社会主体参与改革的空间，最终使改

革合力难以形成。因此,改革不是权力的扩张,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法治恰恰是约束权力最有力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认为,“法律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还是一种阶级内部之间的‘调停形式’。法律的功能不仅仅为权力和财富服务,而且还会施加‘有效的抑制于权力’,使‘统治阶级服从自身的统治’”<sup>[28]</sup>。以法治为准绳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既有利于防止政府滥用改革措施,也保证了改革的正确方向。例如,法律明确中央和地方在改革中的角色定位,严禁让改革中的良性违法获得正当性等。新时代,只有全社会增强法治意识,将法治意识内化于改革的理念和步骤中,才能使合力在社会秩序良好的环境下作用于改革。

#### 参考文献:

-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8.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周雪光.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J]. 开放时代,2011(10):67-85.
- [4] [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 现代化和官僚主义:南美政治研究[M]. 王欢,申明民,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8.
- [5]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3-11-16(1).
- [6]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
- [7] “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希望——西方学者论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与实践 [N]. 参考消息,2004-06-10(15).
-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9] 王绍光,樊鹏. 中国式共识决策:“开门”与“磨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72.
- [10] 贺东航,孔繁斌. 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 中国社会科学,2011(5):61-79.
- [11] [美]罗伯特·福格尔,等. 中国未来30年[M]. 吴敬琏,俞可平,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77.
- [12] 周黎安. 行政发包制[J]. 社会,2014(6):1-38.
- [13] 朱光磊. 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270.
- [14]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5] 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推动改革落地生根造福群众[N]. 人民日报,2015-10-14(1).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 [17]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8] 杨政. 戈尔巴乔夫后悔了 [J]. 环球人物,2006(5):16-19.
- [19] 贺东航, 鸿强.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势能[J]. 东南学术,2019(6):1-11.
- [20] 鄢一龙. 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67.
- [21] 严把改革方案质量关督察关确保改革改有所进改有所成[N]. 人民日报,2014-09-30(1).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
-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8.
- [24]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N]. 人民日报,2015-10-31(1).
- [25] 冯霞,张多. 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J]. 理论探索,2018(5):69-73.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02.
- [27]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4-10-09(1).
- [28] [英]瓦克斯. 法哲学:价值与事实[M]. 谭宇生,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87.

[责任编辑:于洋]

# 机遇与挑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话语体系构建的路径选择

胡志远<sup>1</sup>，胡顺宇<sup>2</sup>

(1.山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0;

2.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当代中国，坚守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主阵地，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既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重要机遇。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于我国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实现中国政治学科学化和大众化，打造一支高水平理论队伍，把传承本土文化与借鉴西方文明相结合，构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不断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83(2020)11-0012-07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要以民主法治为核心，不断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在理论研究和学科重建等方面已取得较大成就，但在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上仍然很薄弱，致使政治学在社会地位、政策影响力等方面比较低弱，“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sup>[1]</sup>因此，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构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不断提升中国政治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创新及其话语权构建是

**收稿日期：**2020-10-10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思政专项）“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现状分析、对策思考及路径选择”（项目编号：2019zsszxx024）的阶段性成果；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习近平关于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018B0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志远（1972-），男，山东临沂人，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概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胡顺宇（1996-），女，山东临沂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等。

## 一、新时代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意义

政治学话语体系对话语权提升至关重要,“政治学话语体系即是政治学人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价值观、思考方式和生存方式、以及使用的术语的统称,实质上是中国政治学人精神和工作特征的一种总体描述和概括。”<sup>[2]</sup>因此,提升中国政治学话语权必须构建完整系统的政治学话语体系。

(一) 构建话语体系是加强政治学话语国际传播交流的基本前提

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不仅能够推进中国政治学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而且能够直接提高中国政治学国际传播和交流的话语权。推进中国政治学话语与世界各国进行传播交流,需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sup>[3]346</sup>提高中国政治学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与交流,使中国政治学在国际上拥有以自己的言语方式传递中国声音的权利,真正实现“有理能够说得出来”,做到用自己语言讲自己故事、用中国话语体系解读阐述中国人的行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sup>[3]346</sup>我们对自己行为和事情最具有发言权,就是用自己的话语形式和表达方式传递自己的思想观点。与此同时,还要结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客观正视中国政治现实,对中国政治问题深入分析,做出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正确解答,使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和认同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问题,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得到国际社会认同,实现“说了就能传得开”。因此,当前我们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尤其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用自己的体系的逻辑形式和思维方式阐释中国政治实践和解答中国政治问题,在政治实践中进行理论概括,提炼形成中国特色政治学的系统话语体系。

(二) 构建话语体系是增强政治学话语世界影

响力的重要基础

在当今社会信息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的环境下,提升中国政治学国际话语权、增强政治学话语体系在国际上影响力,必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sup>[3]162</sup>

在当代中国,提升中国政治学国际话语权,不仅要使中国政治学具有能够用言语表达的权利,而且还要提高政治学言语表达的国际影响力,使中国政治学话语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进行科学阐释和正确解读,用中国声音和传播方式阐述中国政治。在国际交流中,自己不主动表达自己,别人就会替你表达,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西方国家在解读我国现实政治时,就会出现歪曲、误读、甚至丑化的现象。当前,相比西方话语体系,中国话语体系在国际上的声音仍然比较弱小。据有关调查表明,目前有高达近百分之七十的国际受众通过西方网络媒体了解中国信息,而从中国网络媒体了解中国的国际受众只有百分之二十多一点。这些数据表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使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由中国人传递出去至关重要,所以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要“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sup>[4]162</sup>当代中国迫切需要提高我国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将中国理论向世界传播,尤其在国际合作交流中主动表达自己,传递中国好声音,使中国特色充分展现出来,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中国特色,聆听中国声音、喜欢中国故事。

(三) 构建话语体系是提升中国政治学国际话语权的根本保障

政治学话语体系是掌控政治学话语权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是维护中国话语权的理论基础;而在政治学理论指导下解决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政治活动是维护中国政治学话语权的实践基础。掌控政治学话语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有完整系统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形成了系统科学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就增强了坚定的话语自信,也就拥有

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掌控中国政治学话语权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因此，政治学界不仅要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历史文化，而且要对本国政治、政党、制度等充满自信，尤其是在世界交往、学术交流和国际对话中，正确阐释和精准表达中国思想、中国政治时要充满自尊心和自信力。话语方式具有感染力是话语体系的重要方面，要使话语在保持民族性和本土化的基础上，拥有感召性和信服度。中国话语表达方式就是中国式表达，就是在表述阐明中国政治、中国政党、中国制度时，要具有行之有效的表达或言说方式，不仅要坚持和继承我国已有的优秀传统表达或言说方式，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而且要善于学习西方行之有效的表达方式，这需要我们既要有同其他话语体系的平等对话权，也要有被异域文化的接受认同度和话语传播的影响力，坚决摒弃权力任性、态度傲慢的话语方式，坚持政治性、学理性与通俗化、大众化相互结合，使对方可感知、能认同，这样中国政治学才能拥有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和被异域文化认同的国际话语权。总之，中国政治学只有构建科学的话语体系和形成行之有效的话语方式，才能拥有坚定的话语自信和真正的话语权。

## 二、新时代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现实困境

在当前国际、国内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和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权正在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和严峻挑战，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 （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遭遇西方意识形态严峻挑战

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由于调整优化生产关系，经济出现暂时较快发展，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开始盲目崇拜西方文化，逐渐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和热情。当代中国，由于社会转型，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出现价值观多样化倾向，严重影响乃至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号召力、说服力与整合力，有些人开始排斥、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对中国目前现存的一些社会问题进

行攻击，更有甚者对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目标提出质疑，把并非由马克思主义本身造成的结果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意识形态开始猛烈攻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西方所盛行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物欲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沉渣泛起、甚嚣尘上，通过网络媒体进行宣扬传播，致使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盲目追随、忘掉自我，甚至曾经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满现实政治，产生摇摆不定、乃至消极颓废的思想情绪，这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受到排挤和被边缘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看，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确实内在地包含一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还无力从理论上给予它们釜底抽薪式的颠覆和否定。”<sup>[5]</sup>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因西方意识形态挑战开始弱化，新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使中国政治学具体语境发生很大变化。在当代，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严峻挑战，中国政治学必须积极顺应形势发展和时代变化、不断巩固和提升自己话语权。

### （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权受到网络媒体传播考验

在网络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网民数量正在不断增长，网络平台业已成为社会舆论交锋的主阵地、社会热点关注的聚焦点、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特别是在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利益格局不断分化的今天，网络平台更是各种思想文化碰撞的集散地和社会舆情传播的放大器。很多普遍正常的社会现象经过网络传播，尤其是别有用心之人的故意炒作就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而成为影响很大的负面事件。与此同时，国内外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的便利条件传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任意甚至大肆散布各种错误思想和反动信息，妄图渗透、颠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媒体对当代中国政治说三道四、乃至指手画脚，企图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度，唱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

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sup>[3]</sup><sup>336</sup>在当今世界,西方大国掌握着互联网的控制权,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信息强势”、中国“信息弱势”的网络格局,相比之下,我国传统意识形态的传播大为削弱,舆论控制难度加大,把握舆论导向更加困难,整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难度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国家利用意识形态加紧对我国进行侵蚀和渗透,使网络媒体中多元复杂的思想文化和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冲击马克思主义,逐步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当今网络媒体新时代,国家必须牢牢掌握着舆论工具,加强和提高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权,使互联网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了解世界、影响世界的文化传播和科技交流的友谊平台,真正实现传递正能量,减少甚至禁止输出负能量。

### (三)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传播手段严重滞后

在网络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政治学理论传播方式尚以传统为主,明显滞后,严重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理论传播效果。中国政治学传播方式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传播手段简单化。中国政治学理论传播方式比较生硬呆板,没有顾及接受对象的意愿和能力,主要采取抽象、片面方法,甚至用标语、口号进行直接灌输,致使接受者囫圇吞枣、似懂非懂。教育手段也严重形式化,主要通过课堂教育、政治学讲座或以报刊、杂志等媒体刊物较为单一方式,尚没有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现代传播方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往往被裁剪成一些抽象的、片面的、标语口号化的政治概念”<sup>[6]</sup>。这种教条化的传播和教育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严重误解,不能有效宣传和教育群众。第二,传播语言片面性。在传播语言方面也存在很大弊端,语言过于陈旧且带有片面性,主要沿用以往比较规范的经典著作语言形式,以书面语句为主,理论性比较强,过于深奥抽象,不够通俗,不够大众化,人们不易理解和接受。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传播中还普遍存在“非此即彼”“唯我独尊”的片面性逻辑思维方式,使政治学失去了应

有的理论生态环境,从而导致不应有的排斥。第三,传播内容滞后性。当前中国政治学传播内容方面忽略了时代性和实践性的结合,未充分考虑人们实际生活,也没有结合现实的具体案例,而抓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同时,传播的具体内容也不能使受众从内心接受和信服,也没有将政治学理论和时代热点问题有机结合,突出时代的实践特色。在当前参与话题和话语形式日趋多元、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复杂的形势下,如果政治学理论传播方式不能及时跟进,就可能造成话语权弱化甚至缺失。

## 三、新时代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重大机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升中国政治学话语权和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既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也面临着国际国内良好的重大机遇。

(一) 党中央高度重视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政治前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面对纷繁复杂、多元多变的意识形态领域,在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基础上,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战略,为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新的良好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站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sup>[7]</sup>此后,他再次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是党的一项战略性工程,“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sup>[4]</sup><sup>153</sup>这一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进一步升华。党中央提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战略决策,对于推动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具



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提升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构建系统科学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政治学只有及时回答和正确解决当代中国问题,才能赢得民众的普遍认同,进而更好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面对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增强文化软实力,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sup>[8]</sup>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二) 新网络媒体发展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有利平台

当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以往仅仅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单向传播信息的局面,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宣传与传播提供了多维多向多功能的高科技网络平台,第一次把信息传播变成即时互动的现实交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开放性全球性的互联网技术使人们既能够更多借鉴网络了解各国丰富的信息资源,最有效地实现资源共享,也可以利用网络更快更广更好地传播包括政治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网络媒体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当代政治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有助于政治学界获得更多可以用于参考和借鉴的政治学研究成果。网络媒体不但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而且也加强了政治监督的力度,人们在网络交流互动中,在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识与理解的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与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网络媒体,我们可以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治国理念,不断提升和扩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阵地,扩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三) 全球化深入发展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新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化既为世界范围内多种思想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有利平台和良好机遇,又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有利时机,加强了世界对中国政治学的进一步认识与了解,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科学性,这有力启迪了各国无产阶级的觉醒,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涌动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弊端开始充分暴露,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在全球得以彰显。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不但使广大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生存境遇发生根本改变,使人们深刻感受到巨大危机感和幻灭感,而且颠覆了西方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开始重新认识,这从反面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世界评判和剖析的深刻性和正确性,同时也使中国人更清醒地认识到资本绝不可能支配和决定一切,开始全面反思各种主义的荒谬和弊端。全球化使中国学者加深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必将重新审视与赞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持久的生机与活力,坚信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过时。

(四) 世界文化多样化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条件

当今时代,多样化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展现了多重维度和全新视野,极大地拓展和延伸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政治学研究空间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研究领域已经逐步深入和渗透到诸如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政策服务、社会政治运动与稳定等最新领域。社会思想多元化、世界文化多样性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能够融合运用于各个专业领域、多种数据管理分析、各个项目相互协作等技能,进行跨学科、多专业综合研究。中外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手段。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打破单一学科研究的传统限制,与多种学科进行交叉融合趋势日益发展,特别是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信息科学



等诸多学科的结合更趋紧密,学科和专业交叉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与社会学深度融合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实现了大规模、跨学科研究。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互链接,进一步推动政治学跨学科的交叉渗透和互融发展,实现自然科学与社会学兼容,政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思想文化史和生活史等融合研究的发展和突破,更好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权和构建系统科学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

#### 四、新时代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具体路径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传承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文明成果,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打造一支高素质学术队伍,实现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化和大众化。

##### (一)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级为了体现本阶级的意志愿望,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必然要构建本阶级主导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处于国家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是治国理政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坚持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sup>[3] 327</sup>因此,作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代言的话语体系,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坚守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阵地,使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巩固中国人民精神家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的共同思想基础。

##### (二) 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学化与大众化

科学化与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属性,也是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本质特征。科学化与大众化具有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化是大众化的前提基础,只有实现科学化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大众化是科学化的重要保障。只有实现大众化,科学性才能被实践所验证,其功能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科学化是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内容,体现了政治学鲜明生命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因此,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深刻透视中国政治发展的全貌和本质,科学阐释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价值目标。大众化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终极目标,表明了为谁服务的价值取向。政治学话语体系具有自身特定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形式,如果一味使用书面经典词语进行表述,势必深奥抽象、难于理解,甚至诘屈聱牙,不为群众正确理解和普遍接受,就会失去大众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国政治学话语只有实现通俗化和大众化,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正确理解和广泛接受,在实践中被真正掌握和灵活运用,从而更好地为中国政治发展服务。

##### (三) 必须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政治学人队伍

话语权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话语权核心优势在人才优势,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必须打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力超强,有责任、敢担当、高素质的政治学人队伍。政治学人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学术自觉着力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尤其是在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中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埋头实干,不断增强自身素质、提升理论水平,多出作品、出好作品,为国家发声、替人民代言,“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身,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sup>[3] 333-334</sup>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政治学界必须善于科学总结、概括和升华政治实践

的经验教训,以科学的政治学理论指导政治实践。政治学人更应该把追求真理作为天职,努力排除生命过程的各种困惑,有效化解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把生命体验与探索真理相互联系、有机统一,要始终做到不被外部压力所屈服、不为外在利益所诱惑、也不让外界声音干扰。在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政治学人必须遵循学术规范,聚焦国内政治,放眼世界发展,以独立的人格精神、特有的学术品味,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在总结历史、审视现实和预测未来中择取科学开放、独具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实现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创造发展,毫不动摇地信守对实现社会价值的庄严承诺、义无反顾地担当对解决社会问题的重大责任,努力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美好愿景献言献策。

(四) 必须把传承本土文化与借鉴西方文明相结合

传承本土文化与借鉴西方文明相结合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手段。本土化、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的最本质特点,没有民族性和本土化,就没有原创性和主体性,就没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关键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sup>[3] 341-342</sup>因此,政治学界首先应该善于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精华,进行现代化转换,把传统话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对政治学原有话语,尤其要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发展与政治建设的丰富实践和成功经验进行概括、加以总结和提高升华,运用政治学话语体系给予准确表达和科学阐释,充分展现政治学人自我创新、自主创新精神,唱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气派,突出中国特色。同时,我们还要以国际化视野增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对国际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发出中国声音,维护和提升政治学国际话语权,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内通外联。我们必须善于借鉴和吸收在其他政治文化中被政治实践证明具有解释力和预测性、为人民大众所广泛接受的话语,进行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改造,达到为我所有,“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都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的有益滋养。”<sup>[3] 339</sup>尤其要把改革开放以来引入的西方政治学话语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并融入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之中,将国外的术语、概念和范式做本土化的转化,把西方强势话语和主流价值进行创新性改造和本土化的转换,赋予这些话语以本土化民族化的内涵解释和实践形式,使其为我所用。

在当代中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升中国政治学话语权和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对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引导政治文化价值选择,净化政治学话语环境和提高全民族政治话语水平,实现中国政治学界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北京:人民日报,2017-10-28.
- [2] 万华炜. 基于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J]. 社会主义研究,2015(1).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5] 袁铎. 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J]. 长白学刊,2006(3).
- [6] 陈锡喜. 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矛盾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思路的探索[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5).
- [7]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北京:人民日报,2016-04-26.
- [8]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北京:人民日报,2016-05-17.

[责任编辑:姜卉]

# 论西方主流经济学逻辑支点的局限性

刘帅帅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 辽宁 大连 116013)

**摘要:**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背后隐藏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烙印。这套理论体系的所有逻辑论证有三个基础性的逻辑支点: 利己、自由市场、私有产权, 所有主流理论都是基于这三个概念中的至少一个展开论证的, 每个支点都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通过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三大逻辑支点的局限性的分析, 可以对其内容实质有更加深入的领会和更加明确的把握。

**关键词:** 主流; 利己; 自由市场; 私有产权

**中图分类号:** F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20)11-0019-05

自19世纪70年代在经济学领域发生“边际革命”以来, 西方主流经济学者便持续致力于把经济学数学化、物理学化、“科学”化, 然而, 无论经济理论的形式与物理学多么相似, 应用的数学公式多么高深, 也不能据此证明它是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把握。形式的精致严谨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内容的正确有效, 经济学领域的理论研究者必须透过西方主流经济学用无数精巧数学模型装扮的外表去审视其立论的逻辑支点, 从而准确把握它内在的思想。这个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有三个基础性的逻辑

支点: 利己、自由市场、私有产权, 所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是围绕着这三个概念中的至少一个展开论证的进路。

## 逻辑支点一: “利己”是人类的基本性质

### (一) 亚当·斯密论人性“利己”

西方主流经济学把“利己”视为人类的基本属性, “经济人”假定是其理论构建的出发点。把“利己”作为经济学领域最基本的人性假定由来已久, 最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前就已出现在欧洲一些学者的片段式、零散的论述中。后来, 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 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首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系统清晰地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斯密指出: “毫无疑问, 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为自己”<sup>[1]</sup>, 他的关于利己或自利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 每个自然人就是自身私利的天然判断者, 他的行为自然而然地为了追求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第二, 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 每个自然人在追求自身私利时, 不可能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 不然自己的利益也很难实现, 而就是这一点成为了人际间交易的基础。所谓经济人就

**收稿日期:** 2020-10-10

**作者简介:** 刘帅帅 (1981-), 男,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 (大连行政学院、大连市社会主义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体现利己主义本性的人。此后，一代又一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所有的界定中，自利或利己都是最基本的规定，利己是经济人行为的根本目的，是经济人的本质。

## (二) 评析：狭隘的“利己”

以“利己”作为理论的逻辑出发点和最核心的逻辑支点，给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进一步实质性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利己”前提把许多需要真正被关注的问题排除在经济学之外，甚至不能在研究中有效地提出问题，这种现状其实已经充分反证了这种假定的局限性。人类应该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统一的生物群体，不应该片面的以人某方面的自然属性去抹煞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曾从另一个角度有力地强调：“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2]</sup>。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由各种社会关系组合而成的，社会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个体私利的实现以及私有制具体形式必然随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动态变化而变化，绝不仅是利己个人随意选择而来。因此，私有制不是超历史性的必然，而是随生产力发展逐步演变形成，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劳动产品出现剩余并且由私人占有，由此才形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个体小私有制逐渐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目前的历史趋势是人类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形式也在不断地发展，比如从单人业主制发展到股份公司制，从私人资本发展到形式上的社会资本等等。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大谈人的利己心与私有制的天然关系，这本身就与私有制度产生与演进的历史不相符。

多年来，一代又一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者都不遗余力地维护先验“利己”人性假定的合理性，在行为学家们艰难地运用实验方法尝试否定经济人的同时，更多主流学者起身捍卫，以“经济人”是现实人性的抽象为由作辩护，但这种辩护已日渐苍白。其实主流学者们在这里使用“抽象”这个词是不恰当的，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利己”是人性的主体或主要方面，是人类最基本的性质。这样的

话，在这个问题上就无谓再多费口舌了，因为就像“上帝存在”这样的命题一样，无论正方反方都已经无法有效论证。反对者同样可以以“道德人”为先验人性假设，运用同样的方法演绎出一个理论框架，然后用“世间的大爱”是人性的主要方面这一神圣命题为挡箭牌，做到刀枪不入地无视一切质疑。

## 逻辑支点二：“自由市场”自发导向私利与公利的双赢

(一)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的合作扩展秩序”

斯密以人性利己为出发点，逻辑推导出个人在社会中都是为私人利益工作，然后通过个体间交易使社会福利最大，从而得出自由市场是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形式。“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通常既不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sup>[3]</sup>。对于“看不见的手”，斯密说：“每种商品的上市量自然会使自己适合于有效需求。因为，商品量不超过有效需求，对所有使用土地、劳动或资本而以商品市场供应者有利；商品量少于有效需求对其他一切人有利。即市场上的商品量通过价格的调节会使商品量处于有效需求的水平。全部价格与自然价格趋于一致”<sup>[4]</sup>。个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努力适应社会有效需求，使商品市场上存在趋向于均衡的力量。社会因此处于达到或近似达到经济最有效的状态。斯密一手缔造了一个理论上的均衡帝国的雏形，使西方主流经济学从诞生开始就被框定在一个神庙的范围，神庙里供奉了一个有两张面孔的真神：最大化利己和均衡（经济人理性最大化可以通过逻辑推导归结到均衡上，二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由瓦尔拉斯首创，阿罗等人推演至顶峰的，

一举稳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当代统治地位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不过是对“看不见的手”的数学论证而已。

哈耶克被公认是20世纪经济学界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旗手,他将市场效率最大化论证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原则结合在一起。人类社会自发演进趋势和市场经济作为知识网络具有最高效率优势这两个观点有机融合为一体,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打下了社会哲学基础。哈耶克指出,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是知识,最优社会制度就是发现、利用和交流知识最高效的制度。分散性的知识使人类理性只能保持有限状态,因此,社会秩序只能由人类自发行为的演化去趋近最优,人类只能做到试探性地进行社会交往,这样就形成交往模式的多种可能性。最具普遍性和有效性的模式必须经由人类自发行为的自由竞争来获得。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如此演化形成的迄今为止人类最优社会制度。自由市场经济保证了人类在知识积累、发现潜在机会、维持世界多样性和提高人类生存竞争能力等方面有效发挥自身作用。总之,自由竞争市场是能保证人类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的唯一可靠机制,是人类制度建设的至善。任何试图人为设计一种秩序的行为,都是“致命的自负”,它终将把人类引上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用他的独特方式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最有效的、永恒的、自然的、必然的状态,人类的历史发展只不过是为了建立并完善这种制度的过程而已,如果说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还需要什么外力帮助的话,那就是把它身上的一切束缚性因素摧毁。

## (二) 评析:不切实际的“自由市场”

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市场的论证从最初直到现在都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理想色彩。第一,自由市场理论下的社会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表明,信息只要存在不对称,“看不见的手”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妄想。所以斯蒂格利茨认为,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在现代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也是瘫痪的<sup>[5]</sup>。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想会更加清晰,如果真的实现完全信息,那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根本就不需要任何

市场体制,市场本身就是信息不完全的伴生物,消灭了不完全信息,也就消灭了市场体制存在的基础。第二,西方主流经济学打造出的“均衡”理论框架的思想空间非常狭窄。无论是意在构造需求定律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还是为了画出正斜率供给曲线而形成的厂商理论(包括成本理论),都“把尚待证明的几乎是所有一切经济命题都预先设定为已知的”<sup>[6]</sup>,已经没有了向外扩展的内在动力,是一个典型的稳定封闭型思维体系。在前提设定的同时,结果也就已经确定了,中间的逻辑推导不过是在封闭空间内翻来覆去的循环论证。第三,对自由市场制度是人类社会至善的论证是一种枉顾历史的自说自话。即使承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自发演化的结果,难道这个演化过程就此停滞(只剩微小的调整余地)了吗?而且国家和政府的出现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难道是人类历史上的倒退吗?垄断取代自由竞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难道这就不是人类自发演化的正常方向了吗?第四,现代市场经济是国家主动建构下促成的,而不是“自生自发的合作扩展秩序”。资本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权力一直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大规模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进程本身就是典型的通过国家强权实现的血腥过程。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推行过的一切经济和政治制度,如国债制度殖民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都是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现实社会出现经济问题时的典型行为倾向就是把所有罪孽都推到“政府干预”头上,认为解决问题之道就是让个体间的交换和竞争有更充分的自由。他们普遍认为,用政府干预纠正市场失灵比市场失灵本身会造成更严重后果,甚至市场失灵就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所有围绕“政府干预”的理论论证其实都是从相反角度对自由市场优越性的反证,即使是迫于现实作出的一些有限妥协,也仍然以强调自由市场的更强大的天然优越性为前提。其实,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早就把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政府“看得见的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弥补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缺陷,所以问题不是政府应

不应该干预，而是政府怎么进行干预，怎样把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更民主、更强有力的政府和更有序、更复杂规则下的市场竞争是当代人类经济社会的两大突出特征，但是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两者都具有不完善性，从资源配置有效性来看，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都存在。因此，在面临现实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时，既要破除“政府神话”，也要破除“市场神话”。纵观全球，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体制上实行的都是政府与市场不同程度的混合，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选择经济体制有某种程度的趋同倾向。可以说，当前世界上任何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市场经济体制都是政府与市场的结合。

### 逻辑支点三：明晰的“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高效的根本保证

#### （一）科斯定理

私有产权的相关理论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融入西方主流的过程中逐渐上升为整个理论大厦逻辑支点之一。在交易成本控制在一程度的环境中，只要产权得到明确界定（必须是私有化界定），市场机制就会使资源配置实现优化。这其实相当于为自由市场理论加上了一个明确的实现前提。

私有产权理论的集中体现是著名的“科斯定理”，其所蕴含的思想来自于科斯的两篇著名经济学理论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科斯指出，交易成本作为一个统一的变量可以解释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制度的性质，在这个解释框架下，清晰的私有化产权等同于资源配置的高效；产权不私有，就意味着产权关系不清晰，资源配置就会失效，经济社会就会失衡；选择制度模式和决定产权结构的最基本依据就是交易成本。“科斯定理”这个概念不是科斯本人提出的，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术语的是斯蒂格勒（1966）。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科斯定理”有好多种解释，主要有科斯第一定理、科斯第二定理、科斯第三定理、规范的科斯定理和规范的霍布斯定理等。科斯第一定理

是指，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明晰的私有产权界定使经济整体达到帕累托最优，外部性通过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交易被内在化；不同的产权界定只意味着交易双方利益分配格局的差异，而整体经济效率上无差异。科斯第二定理是指，如果交易成本为正，则权利的初始配置很重要。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可交易权利的初始配置就会影响到权利的最终配置，继而影响到社会福利水平。最优的权利配置是能够带来社会福利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的配置；一旦初始权利被界定，仍可以通过交易来改进社会福利，但这种改进只是部分性的，它不可能完全抵消初始配置带来的福利损失。科斯第三定理是指，如果交易成本为正，通过明确分配已界定的权利所能获得的福利改进要优于通过交易带来的福利改进。这一结论的前提假设是：政府能够成本较低地近似估计出什么样的初始权利界定方式有利于社会总体福利，并能够做到公正地界定权利。规范的科斯定理是指，通过法制建设来减少私人交易和协商的障碍，将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规范的霍布斯定理是指，即使在协商障碍较小时，私人理性也可能不足以在利益分配上达成一致，从而造成了福利损失。因此，通过法律将权利界定给对福利损失估价最高的当事人，既可使权利交易不再必要，又可使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

#### （二）评析：“私有产权”的局限性

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产权理论在拓宽经济学研究范围、解决外部性问题等许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很多学者甚至是西方主流大家如萨缪尔森、布坎南等都曾对之进行过批判，斯蒂格利兹直接称“科斯定理”为“科斯谬误”或“产权神话”。其局限体现在：第一，科斯定理的逻辑体系自洽性问题。如新古典效率概念与科斯定理的效率观的矛盾、科斯第一与第二定理的矛盾、自由市场交易有效性与政府干预必要性的矛盾等<sup>[7]</sup>。第二，夸大产权和制度分析的效果。一种产权安排能使交易成本最低，那它就必然会取代其它可能性安排吗，或者说出现其它安排的可能性低到可以忽视吗？针对这个问题，不断有非主流经济学者指出，在制度安排和选择的历史演进

过程中，“适应性规模收益”和“路径依赖”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第三，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太过宽泛，无法准确界定。交易成本是一个分析过程中的“黑箱”，它的分类和性质非常复杂，明确类别和量化交易成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果说交易成本概念最终难以界定，泛指一切使交易无法达成的因素，那么科斯定理在逻辑上就成为一种循环论证。第四、忽视收入分配效应和财富效应。科斯定理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十分有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最终必然会累积成财富效应，对权利的交易产生影响。第五、忽视策略性行为的普遍存在。博弈论中提到的策略性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即使交易成本为零，由于现实经济中广泛存在的策略性行为，双方博弈无均衡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即帕累托最优依然只是一种幻想。而且以上还只是双方交易的情况，通过博弈论能证明，当事人数量大于三时，达成的协议常常是经济学意义上低效甚至无效率的。

此外，“私有产权”的相关理论还有一个明显的局限，即否定公有制经济组织实现经济效率的可能。把产权清晰等同于私有化，这在逻辑上是没道理的。产权明晰的实现更主要是靠合理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而不是简单的以私有取代公有。即使是私有制企业，如果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各项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和支配权也非常有可能是不清晰的，一样会有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委托——代理、法人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不能实现产权清晰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作祟的偏见<sup>[8]</sup>。

### 结束语

“利己”和“自由市场”两大支点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与生俱来的“原生态”命题，“私有产权”则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根据历史现实变化不断做出自身可接受的理论调整的过程逐渐确立起来的。“私有产权”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然高效加上了前提。

西方主流经济学三大逻辑支点之间不是互相独立的关系，它们既有统一性也存在对立性。其中

“后天”加入的逻辑支点与“原生态”的逻辑支点就有较深层次的矛盾。“原生态”命题崇尚的是自然、自发、天性等自然主义理念，根本上来说是反制度主义和反历史主义进路的，而产权命题带有很鲜明的制度主义、历史主义色彩，这是一种方法论层面的矛盾，目前没有得到调和。这也反映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逻辑自洽性问题。

### 参考文献：

- [1]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101-10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6.
- [3]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27.
- [4]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52.
- [5] 斯蒂格利茨. 信息经济学与范式革命[M]// 吴敬琏. 比较:第四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2:11.
- [6] 卡尔·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刘丕坤,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43.
- [7] 李风圣. 论科斯定理的矛盾[J]. 社会科学战线, 1998(3).
- [8] 崔之元. 科斯定理是真理还是同义反复[M]. // 崔之元. 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 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姜卉]

#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德治与法治关系研究

张志恒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是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 德治、法治和社会生产力及其表征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息息相关, 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活动的产物。德治是自然经济下的必然产物, 在农业社会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传统伦理实体不断遭到侵蚀, 德治作用的有效范围也在不断地缩小; 而法治则借由其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独立、自由和平等个体的有效约束, 成为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治理方式。德治的自我扬弃并嵌入法治之中,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德治和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以法治为主, 以德治为辅。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 德治; 法治

**中图分类号:** B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20)11-0024-05

## 一、问题的提出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是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 有利于我国在西方治理话语占据主流地位下寻找与国情相适应的治理形态, 有利于提升中国之治的治理效

能; 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能力。因此, 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来,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治与法治关系再次引起人们热议。目前, 学术界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有学者从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同宗性与交叠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 来阐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正当性的理论基础<sup>[1]</sup>。有学者则从休谟法则出发提出: “法与道德有何功用是一个事实性问题, 法的统治抑或道德的统治却是一个规范性问题……法的功用不等同于法治, 道德的功用也并不就意味着道德的统治, 道德与法在功用上的相辅相成, 并不当然地导出德治与法治作为治式的不可偏废。”<sup>[2]</sup> 又如, 有学者认为: “德治与法治既非‘并列’关系也非‘主次’关系, 而是一种互补的‘结合关系’。”<sup>[3]</sup> 与之相反, 则有学者提出: “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 但在现代社会中, 法治是主流。”<sup>[4]</sup> 再如, 有学者立足德治与法治并举的视角强调: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德治应当坚持‘中德为体、西法并行’的原则, 在保障现代性基础上凸显中华道德文明的历史传统, 努力实现国民心理认同; 在法治的选择上, 应侧重平衡之治, 同时袭用西方的公法理念实现与中

**收稿日期:** 2020-10-27

**作者简介:** 张志恒 (1994-), 男, 福建厦门人,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



国的肌体相融。”<sup>[5]</sup>有学者指出：“德治与法治不仅在抽象意义上具有逻辑上的相容关系，也在历史经验语境下具有理论上的相容关系。”<sup>[6]</sup>

上述论断牵涉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学科，所采取的解释进路存在着差异。不过总体而言，学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界定德治与法治关系：其一，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是结合的。其中，有的观点认为德治高于法治；有的观点则强调法治的主导作用；有的观点主张德治与法治同等重要。其二，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是割裂的。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学者们却只是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出发，将两者的关系延伸至德治与法治关系上。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上，大多数学者们都离开了“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sup>[7]</sup>，局限于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内容的争论，试图以此证明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合理性，这必然导致历史与逻辑统一关系的破裂，使得德治与法治真实的历史关系遭到遮蔽或曲解。因此，有必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把握德治和法治存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廓清德治和法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进程的应有之位，进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德治与法治相关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德治与法治相关性是在国家统治、管理和治理的历史活动中得到确证并不断发展的。德治与法治需要以具体化方式把握国家统治、管理和治理的历史演绎，并面向既定的社会现实，才能捋清自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sup>[8]</sup>生产方式、交换方式是历史活动和现实生活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们规定和制约了国家治理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图景。法治与德治作为国家治理的意识与手段，作为上层建筑的理论范畴，必须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相适应，与生产力的水平相匹配。“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sup>[9]</sup>当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的时候，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及文化内容会发生不断的革新，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推进社会法治化能获得人

们的普遍认同，因为法治化所产生的治理效益，能够有效地克服传统历史文化退场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起到实现公共利益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相反，当社会生产力处于较低水平时，国家超前地推进社会法治化建设，将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这种条件下，社会法治化不但不能被人们广泛认同，而且所形成的约束力也不能代替传统历史文化所产生的治理效能，国家和社会可能会走向动荡不安的境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全球性偏离民主化轨道的现象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根据一项统计，在1958年世界上32个民主国家中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到七十年代中期已经变成了威权主义国家……比如：智利、乌拉圭、菲律宾等具有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或更长时间的民主政权。”<sup>[10]</sup>究其原因，这些国家的生产力不够发达，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及其文化蕴涵着大量的传统要素。传统思想、风俗和制度等支配并规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公共利益方面依然发挥着主要作用。但这些国家受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诱惑，在先前建构的传统历史文化还支配着社会秩序之际，超前地推动自由主义法治的建设，而自由主义法治的观念和实践却不能被人们直接地认可，不能及时产生维持社会秩序所必须的效能，不能有效地满足人们的公共利益需求，导致国家和社会最终落入不稳定窠臼。除了上述国家外，冷战后选取自由主义法治的部分东欧国家和阿拉伯之春后的部分北非国家，其情况也大抵相同。这些国家多数漠视自身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忽视了国情和世情，盲目地采取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而陷入经济停滞和衰退。

由此观之，德治与法治建设既不能滞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能超前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sup>[9]</sup><sup>533</sup>如今，工业和交换的历史在我国聚焦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sup>[11]</sup>，这一矛盾表明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我国社会生产力在不同区域性之间的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生产力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致使当代中国传统性问题与现代性问题并存，从不同角度制约着德治和法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态势。因而，法治能否成为一个地区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公共利益的主导性力

量，主要还是要审视这个地区的生产力是否发达，生产力所显现的经济政治结构是否完成了马克思表述的从“人的依赖性关系”到“物的依赖性关系”的转变。

从历史上看，德治作为自然经济下的必然产物，在农业社会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德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地解构和重构，但始终没有完全从历史舞台退场。自鸦片战争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的探索中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的思想演变，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康有为“托孔改制”，从三民主义到新文化运动再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德治在我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地位不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地区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潮流下，个人利益的追求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这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生根发芽提供了基础，错误思潮衍生的社会问题不断挑战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维持这些地区社会秩序的传统德治发生了破裂和错位，但维持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法治却未能全面地融入人们日常生活。这进一步酿成传统的德治在乡村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自然”地复现，再次成为这些地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的生产力不够发达。建立在不发达生产力上的社会结构依然保留农业社会的诸多特质，束缚和钳制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确切地说，我国乡村地区人们的交往关系依然处于熟人文化的历史阶段，这些地区依然处在以家庭、家族为基点的社会状态，仍旧是“人的依赖关系”社会阶段。“熟人好办事”“讲规则不如找关系”和“以权压法”还是许多人潜在的规则信条和思维方式。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地区仍然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sup>[12] 51</sup>，被“人的依赖关系”所主导。每个人都以“人伦”为基础，都“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sup>[12] 44</sup>。这些地区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加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sup>[12] 57</sup>。人情与关系是这些地区潜匿的日常生活原则，伸缩性和灵活性是这些地区所采取的治理方式的必然前提，倘若遇到问题就诉诸法治的方式，也会因为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受到人们不同程度的抵触。“（现行的司法制度）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不能有效

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sup>[12] 96</sup>因而德治这种“软性”治理方式的“复现”，更贴近生产力不发达的乡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更适合农业社会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而德治的复现主要依靠的却不是国家力量，而是社会力量，比如：农村红白喜事的举行依赖家族组织、邻里之间冲突的解决离不开乡贤、乡村发展计划的决策离不开乡村自发组成的理事会等。

相反，以工业社会为主的地区的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人的依赖关系”所依存的生产方式及经济政治结构发生转变，传统伦理实体不断遭到侵蚀，传统历史文化所展现的习惯逐渐从人们的观念世界褪去，德治作用的有效范围在不断地缩小。“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sup>[13]</sup>随着商品经济在城市地区的蓬勃发展，法治则借由其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独立、自由和平等个体的有效约束，成为城市地区不可或缺的治理方式。人情与关系在城市地区不再变得尤为关键，“人治大于法治”的思维惯性不再是现实生活的普遍现象。“物的依赖性关系”成为当前这些地区社会政治秩序的总体性解释原则。人们希望在以工业社会为主导的城市地区确立法治，通过法治规范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确保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自由和平等的竞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治随着旧有秩序的裂变而兴起，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亲切概念，展现着人们对公正秩序的价值倾向。人们对德治表现出一种陌生的疏离感，对民主、法治和公平等表现出一种亲切的认同感。

这种区域性治理方式的不平衡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这表明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上，必须既讲法治又讲德治。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以法治为主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进程中，德治与法治的并存关系是一种德治主导还是法治主导，或德

治、法治相互平衡的样态呢？由于这一问题是在历史发展中生成的，因而考察德治与法治并存的具体样态需要置于社会形态演进的视野下进行。原因在于，社会历史总体上是进步的，这一进步表现在社会形态的发展遵循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

一般而言，法律在封建社会就已经出现并相对成熟，但法治的历史起点却定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阶段，西方国家为了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凭借法治确立了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确定性规范。现代法治作为工业社会的成果，改变了现代政治社会的治理框架，支配着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发展趋势。而德治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主要支配着传统社会政治秩序。虽然德治随着社会历史变迁而变化，但现代的德治仍然保留大量传统要素，制约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态势。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法治成为理解全球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核心范畴，而德治却逐步丧失其在当今“世界历史”中的合理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德治这个源于封建社会的治理方式，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境况也将有所改变。德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治理方式；相反，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是一种主导性的治理方式。民主政治、多元文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而民主政治、多元文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需要把法治奉为圭臬。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以法治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以法治为主”并非意味着唯一，治理方式的有效性在于其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现实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意味着德治和法治的融合发展是必要的。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法治为主、德治为辅的治理方式是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必须贯彻的治理原则。事实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中“制度”一词出现高达220余次，“法治”一词出现40余次，“德治”一词出现2次。这表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指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意味着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导性手段，德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辅助性手段。同时，“全面依法治国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sup>[11]22</sup>可见，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无不彰显依法治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国家治理现代化把法治作为自身总体性解释框架，德治的实施必须置于法治大框架下加以阐释与施行。为此，需要多举措齐抓并进改善法主德辅体系，确保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一，法主德辅体系建设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遵循。不同社会阶层总是基于自身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而形成对法治与德治的观念，这些观点既可能是略有差异的，也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法主德辅体系的建设工作将面临着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而是循序渐进的改革，本质上是不同社会力量的较量和传统利益格局的重塑。“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sup>[9]44</sup>，所以只有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遵循，才能充分利用党自上而下组织体系，科学有序推进法主德辅体系建设的各项决定；才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宣传力，突破社会各阶层在法治与德治问题上的思想观念束缚并凝聚起最大限度的利益共识；才能使党在学术论争过程中保持理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在法主德辅体系的改革道路上前行，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第二，法主德辅体系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在当前经济结构条件下，社会上依然会滋生熟人文化、关系逻辑和权力意识等非规则观念。这些落后的观念从不同方面阻碍着社会成员法治意识的树立，制约着法主德辅体系的运转。“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sup>[14]</sup>在社会成员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表征社会共同信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为社会成员提供法治、正义等精神需求。因此，法主德辅体系建设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法主德辅体系建设的始终。只有让法治观念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才能为法主德辅体系的有效运行提供思想条件，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第三，法主德辅体系建设必须以健全制度体系和提升治理效能为必然归宿。一方面，法主德辅体系建设是以规则意识为导向的制度体系化过程。这一过程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从历史上看,德治并不必然导向规范化,因此德治的自我扬弃并嵌入法治便成为新时代德治与法治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sup>[15]</sup>也就是说,要在保留道德内容的基础上促使德治形式向法治形式转化,以便更好地适应工业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治理要求,满足社会成员对公正的追求。另一方面,法主德辅体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之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制度优势并不会自然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也不会自觉地满足社会和人民的发展需求。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创造条件将法主德辅体系所展现的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便实现制度优势发挥和治理效能提升的统一。

#### 四、结语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德治与法治都是历史活动的产物,并非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同步产生。不可否认,以德治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相对于以巫术和神术为基础的奴隶社会,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性,但随着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演进,德治的历史局限性也显现出来。然而,法治在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中却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但无论是德治还是法治在不同历史阶段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sup>[9] 498</sup>,所以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会生成与该时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相契合的治理方式。法治也并不是某种一经发现就永恒成立的普世真理,而只是由于商品经济和大工业的发展进步才取得了其本身的合理性地位。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终极治理方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始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与规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迁。只有在当前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下,法治才表现为一种历史必然性。对治理方式的肯定性理解与否定性理解并不能以现实生活条件所

赋予人们的思维定势为认识界限,不能诉诸纯粹的表象,对法主德辅体系的科学把握,必须始终不断地放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加以探究。

#### 参考文献:

- [1] 王淑芹,武林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J].伦理学研究,2017(3):47-50.
- [2] 孙莉.德治及其传统之于中国法治进境[J].中国法学,2009(1):69-76.
- [3] 王淑芹,刘畅.德治与法治:何种关系[J].伦理学研究,2014(5):64-68.
- [4] 张中秋.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3):237-244.
- [5] 吴俊明.论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法治与德治并举为分析视角[J].法学杂志,2017(5):28-38.
- [6] 舒国滢,王重尧.德治与法治相容关系的理论证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5(5):43-49.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80.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92.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0-21.
- [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5.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 [15]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J].求是,2015(1):3-8.

[责任编辑:于洋]

#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研究

卜红双，蒙静怡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经历了从1935年到1947年共十三年，完成了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任务。在延安的十三年，同时也是在革命实践中进行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对思想建党作出了的历史性贡献。对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必要性、主要内容的研究对新时代有着现实启示。

**关键词：**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83(2020)11-0029-07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完善自身建设，从弱小逐步走向不断成熟发展的关键时期。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在瑞金时期，党通过举办短期培训班、进行自我批评和发挥政治部的影响等途径，对思想建设做出了初步探索。随着中国革命实

践的深入发展，党的理论水平和自身建设能力在延安时期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中国共产党关于思想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这一时期进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斐然的繁盛期。

## 一、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视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sup>[1]</sup>进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个相对和缓的外部发展环境，开始积极地总结中国革命和自身的发展规律，无论在理论总结还是在实践探索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为了适应全国抗战形势、加强自身发展以及夺取全国政权的多重需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成为一个摆在全党面前的突出课题。

(一)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全国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用尖牙利爪撕开了中国东北，开始了对中国的暴徒般

**收稿日期：**2020-09-30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委托项目（项目编号：L19WTB011）、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L18BLW052）、辽宁省教育工委高校党建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8GXDJ-ZD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卜红双（1972-），男，辽宁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辽宁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蒙静怡（1995-），女，辽宁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执政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的侵略行径，肆意进行各种侵略活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国民党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猖獗攻击则采取了“攘外安内”的反动政策，全然不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生死危亡。中国共产党顺应中国广大人民的历史诉求，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最早举起了抗战这面旗帜，并迅速组织进行了抗日行动，主动承担起了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艰巨任务。

团结并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是历史和人民共同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如何进行反抗并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领土，是中国共产党自抗战开始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而领导抗日战争不但需要全国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而且更加需要一个强健有为的领导力量。因此，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国民党仍然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不断制造白色恐怖，国内社会人心惶惶，这种状况在党内不同程度地也反映出来。毛泽东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sup>[2] 1094</sup>

为夺取抗战胜利，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要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积极统筹联合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进行全面抗战。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确立，首先必须要在党内达成思想共识，才有可能形成一致抗日的局面。同时，面临当时党内党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时刻腐蚀和冲击，我们党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凝聚全党思想形成一致的认识，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首当其冲的就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二)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适应党自身发展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始终坚守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sup>[3] 77</sup>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之处，更

迫切的是要实现使党员思想上入党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先后出现了三次严重的“左”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党的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危亡的历史关头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最为亟需解决的错误军事路线。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独立地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时代化、本土化，用以解决中国问题。但是由于当时战争事态的紧迫性等条件限制，没有及时处理党的思想路线。刘少奇明确指出：“在党内反映了大量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甚至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思想，也经常通过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传达到党内来。”<sup>[4]</sup>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以及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前进造成了严重挫折。因此，清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成为当务之急。

在党中央进驻延安以后采取了积极的方针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党外人士进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之中。与此同时，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党也需要凝聚更多的革命力量来壮大自身，以便更好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但由于我党长期处于农村区域，新进入党内的一些成员大多是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他们多数人有强烈的革命意愿，但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的训练，存在着素质低下、理想信念动摇、组织纪律性不强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还有一小部分动机不纯的分子趁机混入党内，使我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遭到削弱。因此，为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有必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三)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适应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的需要

在延安整风运动收获巨大成效，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背景下，解放战争也即将取得胜利，截止1948年党员数量急剧增长到300万人。当时情况下我党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取得全国政权之后，作为执政党应该如何如何在党员数量急剧增长、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保障全国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地顺利进行。

为即将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做准备,并及时清理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的不正之风。1947年,毛泽东和党中央结合土地革命,在解放区内的各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开展了以“三查”和“三整”为主体的整党运动。同时期,我们党在军队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新式整军运动,采用民主的方式对军队思想纪律进行了整顿,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大幅提升。经过“三查”“三整”和整军等一系列的运动,全党全军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得到明显加强,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综上所述,在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不仅符合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民族独立的迫切愿望的必然选择。

延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不仅得益于社会现实的推动,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党在长征胜利以后,解决了党的生存危机,从而为党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经过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以及洛川会议,我们党首先在政治上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党的思想建设有了组织上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生死考验,对于中国革命和党自身的发展建设规律都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自主意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此同时,毛泽东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书籍的集中阅读,如《费尔巴哈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共产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断提高,形成了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反对自由主义》等大量理论著作,并且重视用科学的理论武器对全体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从而提升了全党的理论水平。自此,我们党在延安时期进行思想建设有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坚实基础。

##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

延安时期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

夺取抗战胜利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党不断加强自身肌体建设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路线发展成熟并得到确立,以整风运动为显著特征的党的思想建设工作也顺利开展并收获到巨大成果。

### (一) 以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

延安时期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确立时期,是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不断探索,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精华的重要历史阶段。在延安时期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毛泽东同志亲自调查实践,根据对革命斗争情况及规律的深刻把握,及时总结现实经验,在进行科学研判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大量著作的撰写,为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做出新的贡献。在党的七大上,正式将凝聚全党同志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

毛泽东早在古田会议就提出了“思想路线”的这一理论概念。1937年,毛泽东在其所著的两部哲学方面的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之中,他作为党的领导人从哲学的角度与高度分析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同时对党的思想路线也进行了阐述:“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sup>[3] 296</sup>。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创造性地引用“实事求是”四个字,并适时地对其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sup>[3] 74</sup>、“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sup>[5] 534</sup>。强调在处理中国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考查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僵化坚持“本本主义”,两篇文章的发表实际上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植入了理论积淀。

在党中央进驻延安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统一党内思想,开启了一场全党范围的有关党的建设活动,即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



报告中,第一次针对“实事求是”四个字进行了严谨科学的理论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sup>[2]</sup><sup>801</sup>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批判了党内不注重国内现实情况的现象,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应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情况,并且向全党提出要求:必须要做到因时因地学活用好马克思主义。在党的七大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式以党的章程的形式确立下来。毛泽东思想也因此和指导党的建设具体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完善。

## (二) 以整风运动作为主要方式

进入延安时期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得到了很大增长,很大一部分有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愿的革命者加入到中国共产党之中,其中农民占多数,他们思想理论素质普遍较低,将一些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同时,为了提高全党思想政治理论水平,有必要对全体党员进行一场意义深刻的思想理论教育,即整风运动。

首先,加强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要加强党员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长期以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产生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宗派主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必须对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194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的文件发布,毛泽东担任组长,并将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作为其研究对象之一。1942年10月召开的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结合整风精神以及当时西北局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深入学习。毛泽东认为只有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且结合实际情况,仔细研究国内外的各项斗争经验,“提高全党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系统地批判和克服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才能消除产生错误的土壤和条件。”<sup>[6]</sup>在延安时期建立了干部专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组,成立了干部教育组,为党员干部学习马列原著专门成立了编辑部,负责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其次,加强党的根本宗旨的教育。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原则上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始终坚持运用群众史观和党的群众路线去解决问题。在延安枣园,由于天气干旱,群众饮水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的一部分同志同当地群众一道修筑了一条长达6公里的水渠,被当地人成为“幸福渠”,成功解决了困扰群众的饮水难问题。毛泽东始终强调要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不懈追求,只有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够取得最终的根本性胜利。

最后,加强国史和党史的教育。1941年9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组织编写了《六大以来》这一党的历史文献,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党史学习提供了一部高质量的教科书。同时,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具体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1942年12月通过的《关于延安时期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中,将历史学科的学习作为党员干部的重要学习内容,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思想发展以及历史经验相结合,同步学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便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汲取各项经验教训,对党员干部进行党史教育提供客观真实的学习材料,经过审慎的分析研究而形成的历史性文件。

读史可以明鉴,中华民族有着绵延数千年的历史,其中有很多值得学习与借鉴之处。而学习党史可以更好的了解我们党的历史上所经历的苦难与辉煌,从而汲取经验教训,为党的健康永续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 (三) 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基本方针

在1942年毛泽东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关于处理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适时地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在延安整风中,正是因为认真执行了这个方针才取得了重大



的成功。通过历史实践证实,在我们党内凡是取得重要成效的整党整风,都是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进行党员教育采取的重要方针,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惩前毖后”。即必须深刻地批判揭发以前的错误,并且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批判,用更加谨慎的态度处理工作中的问题。二是“治病救人”。即“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sup>[2] 828</sup>这一方针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共产党人既能够敢于承认问题,也有勇于主动寻求解决方法的决心和信心。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基于党内存在的主要矛盾提出的。在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以前,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党内长期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有最为坚决并且彻底的革命性、组织纪律性等天然的优点。但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并且工人阶级数量先天较少,因此,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有着革命的一面,但有着各自阶级的局限性,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当时的党内斗争是一种思想上的斗争,既然是思想上的斗争,那么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毛泽东强调解决党内矛盾就是要通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而达到团结同志、强健党的肌体的目的,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斗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从团结的角度出发,才能够收到理想的成效,使得我们党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 (四) 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作为重要方法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政策,最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上被提出,是进行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延安时期特别是整风运动期间得到了具体实践和进一步发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内民主建

设的有效方法。在延安时期以前,党内民主严重缺失,多次出现过或“左”或右的错误。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就已经对党内的极端民主化表现进行了深刻剖析,同时指出了其纠正方法。在“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引导下,尤其是遵义会议前,由于王明教条式地固守共产国际的指示,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失败的境地,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进入歧途,党险些丧失前途和生命。《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是这样记载的:“要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sup>[5] 1096</sup>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批评与自我批评被作为党的建设重要手段方法之一写进党章中。延安时期正是因为严格执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才得以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推向成功。

### 三、延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效,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论是在对理论研究的丰富完善方面,还是在实践探索的深入推进方面,在党的革命建设史上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认真研究延安时期的党建工作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 (一) 坚持以政治性作为思想建设的统领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思想建设为主线,全面统筹党的各项建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继续前进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征途中,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寻求方法思路。延安时期,我们党经过艰苦的革命实践,在认真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坚决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拥护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党在延安时期始终将政治建设贯穿在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党内民主集中制得到大力维护，党内民主生活正常有序开展，使得广大党员有话敢说、有话能说、有话会说。民主与集中的发挥相得益彰，共同形成了良好的党内生态，从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取得了民族战争的完全胜利，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愿望。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临更加复杂而多变的国际环境，只有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道路上，继续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在当前情况下集中全党全国力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共同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sup>[1]</sup>

### （二）坚持以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经过实践、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实事求是的基本遵循体现在一系列的讲话以及具体工作部署之中：“实事求是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sup>[7]</sup>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使得我们党真正能够切合实际的使用各种形式的具体行动，指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走出曾被侵略欺辱的苦难历史，走出独具风格的中国道路。当前，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着国际国内环境的风云变幻，要实现宏伟复兴的中国梦，要获得全方位多层次的创新复合型发展，就更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认真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并牢牢把握住世界发展的“变”与“不变”，深刻剖析并提出适合中国的独特发展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够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才能够采用客观有效的手段去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

样的问题与矛盾。加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贯彻落实，不仅是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前提。因此，必须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之中始终采用科学谨慎的态度，落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三）坚持以主题教育净化党内生态环境

延安时期，为了从本质上解决党内的复杂问题，对党员进行一场灵魂深处的思想洗礼，在毛泽东同志以及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推动下，开展了一场前无古人的全党整风，其根本特质就是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题，纠正各种错误路线和错误的思想倾向，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通过采用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方法，从而实现了党内生态的净化，实现了党内思想的团结一致。

通过主题教育形式自上而下地统一思想、整顿组织，从而营造了良好的党内生态环境。整风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独特创新成果，开创了以主题教育形式解决党内问题、净化党内生态的先河，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党在延安时期纯洁党员干部思想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为以后党的建设工作确立了基本原则和重要遵循。党的七大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建设重大成果写进党章。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上被正式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为成功解决党内问题的提供了思路 and 理论支撑。

进入新时代，世界形势变化万千，我们党内生态建设面临的社会环境更加复杂多元，广大党员干部面临的现实社会问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运用各类主题教育统一思想、团结组织的历史经验仍然有着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延安整风采用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相较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压”更能体现出党内的民主化生活。因此，在解决党内实际矛盾的基础上，更加能为广大党员干部所接受。所以，在新时代的条件下，要继续坚持并且不断发扬

利用主题教育形式统一党员干部思想、提高党内生活的民主化程度,实现党的健康永续发展。

#### (四) 坚持知行合一提升党员思想素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党员的理论学习教育和学习效果评价始终贯穿在党的思想建设的全过程各环节,并且建立了一个长效化制度化的学习机制。如在整风运动过程中,要求每个党员认真学习中共中央颁布的二十二个学习文件,“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sup>[8]</sup>,同时对照自己,采用了报刊、会议等多种方式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实践提供良好的现实条件。对于丰富党在革命时期从理论学习到具体实践的转变经验有着特殊意蕴,对党员思想理论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党员的思想教育提到了全党层面的高度和深度。党的十九大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多次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sup>[1]</sup>。从2013年6月至今,在党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每一次的思想教育工作中,都坚持强调了将党的思想建设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按照‘照、正、洗、治’的总体要求,积极引导和教育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群众史观,改进党的作风,全面夯实执政基础,提高为民服务的本领”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指明的主题内容,不断修炼党性,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提高道德境界,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主张,理想信念更坚定、党性觉悟有提高、为民观念更执着、担当作为有力量到当前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的实际效果可以看出,我们党在新时代开展的各类思想教育活动,都不是单纯的说教式,而是与实践活动紧密相关,都是通过读、学、悟与知、行、践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知行合一,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中丰富的多层次联

动效应。不断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改造和提升党员的政治素质,加强全党同志的思想建设,这与延安时期开展的思想教育活动方式是紧密契合、一脉相承的。“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只有通过知行合一,坚持以学促行、以行践学的方式,在学、信、行中持续坚定理想信念,在知行合一中不断深化为民宗旨的行动实施,才能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收到实际效果,才能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 [2]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4] 刘少奇选集: 上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323.
- [5]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6] 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编写组. 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147.
- [7]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读本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3:130.
- [8] 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9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194.

[责任编辑: 李成林]

# 毛泽东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研究

姚茂军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遂宁629000)

**摘要:** 毛泽东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 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呈现出鲜明的“被动”与“主动”, “反思”与“前瞻”等特征, 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其鲜明的特色和突出贡献在于: 始终坚持反对“左”、右倾路线错误, 从斗争中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 成功地缔造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手段——整党整风, 提升了党的内聚力、领导力和战斗力; 首创了采取党的历史决议的形式, 从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视角, 科学、辩证、客观地评价党的历史功绩与错误, 从理论上升华了党的自我革命经验。

**关键词:**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 整党整风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20)11-0036-05

纵观近百年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呈现出鲜明的“被动”与“主动”, “反思”与“前瞻”等特征。从问题视角看, 党的自我革命因问题而生, 具有被动性和反思性。从党的目标视角看, 为了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人力资源

与党的目标的一致性与匹配度, 党必须进行主动的自我革命, 具有主动性和前瞻性。现实的客观问题和新的主观需要必然催生新的革命思想,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sup>[1]</sup> 毛泽东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思想, 正是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特别是适应加强党自身建设的需要, 通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 一、政治路线革命: 反对两条路线

道路决定命运, 路线指引道路。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是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然而它“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sup>[2] 186</sup>。历史上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频繁受到“左”、右倾路线的干扰, 不时出现困难与危机, 为此, 毛泽东始终坚持既反“左”又反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确立和维护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 党内“左”、右倾路线代表者不能廓清中国革命的实质, 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上犯有严重的错误。1926年9月, 陈独

**收稿日期:** 2020-10-15

**基金项目:** 2017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反腐倡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三者逻辑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 17SB0520)。

**作者简介:** 姚茂军,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党的建设。

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斗争?》一文中认为,国民大革命的胜利和政权应“归诸于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他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sup>[3]</sup>。由此,陈独秀的“两阶段革命论”逐渐形成,最终导致了其右倾投降主义的产生和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尔后的历次“左”倾路线代表者矫枉过正,想毕其功于一役,超越民主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故其制定的革命政策与任务,虽然包含许多民主主义成分,但是他们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对象,甚至反对上层的小资产阶级,而没有把农民看成是反帝反封建的决定性力量。1931年以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因“九·一八”事变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已取代阶级矛盾而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但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不但未能看清这个变化,反而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和第三派的抗日要求,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它反对资本主义和富农,声称消灭富农经济,剥削者皆无参政权。它实施了超越性的“阶级路线”政策和夸大的肃反政策,进而使当时的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被严重歪曲,致使党的革命运动陷入孤立无援而频遭挫折。

不仅如此,党内“左”、右倾路线代表者在革命战略和革命路线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历次“左”倾路线的坚持者“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sup>[4]</sup><sup>96</sup>。他们总是寄希望于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在一城数城的首先胜利,在一省数省的首先成功,进而促成全国革命高潮和胜利。“左”倾路线者希望复制俄国革命的城市中心主义,结果导致了城市工作的破坏,革命势力的重大损失。在1933年以后,临时中央被迫“下乡”进驻农村革命根据地。此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坚持者,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依旧坚持城市中心主义,轻视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军的发展,革命工作因此遭到了重大损失。他们不合时宜地坚信“正规化”和阵地战,不赞同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游击战和兼游击性的运动战。甚至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忽视红军势单力薄的客观现实,错误地提

出了“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sup>[4]</sup><sup>97</sup>等口号。

通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和坚决地反对党内“左”、右倾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准确地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实质,提出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早在1925年12月,毛泽东就在其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明确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sup>[2]</sup><sup>8-9</sup>。在此,毛泽东前瞻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明晰了谁是领导者、谁是朋友和谁是敌人等阶级关系问题,其中暗含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于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即现阶段的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且“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sup>[2]</sup><sup>77</sup>。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广泛需求,与官僚资产阶级有着明显的区别,是革命必须团结的力量。而在农村必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保护富农,原则上给地主留有生活出路,这些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对于革命战略和革命路线,毛泽东则突出强调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意义。斯大林提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sup>[5]</sup>对此,毛泽东十分赞同,并创造性提出了不同于“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革命道路的中国革命道路。他认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在乡村,应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武装斗争是其主要的斗争形式,以农民为主的军队是其主要的依靠力量和组织形式,而其主要的战争形式应是农民游击战,而非工人阵地战。农村革命根据地之所以必要存在,既根源于中国主体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也根源于前两者的必然结果——国民党统治期间地方军阀间

长期的矛盾冲突和战争。毛泽东指出，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与发展必将成就中国革命的胜利。

## 二、组织路线革命：反对宗派主义

政治路线出现错误，势必相应地产生错误的组织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党中央的时间越长，为其服务的组织路线产生的危害就越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次“左”倾路线的坚持者，既排斥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也排斥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他们不但脱离群众，违背群众的意志和利益，而且为了自己的私利在党内外形成了宗派主义。追根溯源，八七会议终结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物极必反，其反右为其“左”倾错误的发展开创了道路。在组织上它开始夸大党内斗争，形成了极端民主化势头，助长了党内宗派主义的发展。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路线，排斥与之相左的劝谏与批评，一味地坚持肃清所谓党内的“右倾主义”，实际是以此作为掩饰打击排斥异己，党的宗派主义因此获得进一步发展。而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其统治中央机关长达四年之久。他们无视组织纪律，密谋组建了对抗中央的所谓临时党中央。他们不但坚持使用自己的亲信和拥趸——“斗争干部”，来充实和改组中下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甚至擢升“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占据中央领导岗位。与此同时，他们过火排斥打击曾犯李立三的“左”倾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甚至污蔑瞿秋白等领导干部走所谓“调和路线”。若党内有谁对其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决策表示商榷、不赞同、不满意、不积极执行等，不问缘由，皆会被他们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sup>[4]</sup><sup>986</sup>。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组织路线是党组织工作的根本方针和根本准则，是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外在形态和必备保障。毛泽东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sup>[4]</sup><sup>984</sup>。为此，党必须以正确的组织路线密切联

系党和人民、领导干部与党员，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1928年中共六大首次提出了党的“组织路线”的概念。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初步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党的组织路线思想：强调应同时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反对极端民主化、小集团主义、非组织化等错误思想观念。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著名论断，并且指出，领导干部的标准应是“才德兼备”，干部路线应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这些论断和论述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组织路线已经确立。组织路线确立和实施的过程，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党内宗派主义，凝聚着党心、民心的过程，就是坚持总结革命经验教训，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

## 三、思想路线革命：反对主观主义

任何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形成，皆源自于其缔造者思想认识的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它们皆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忽视了现实国情和人民群众现实的主观需要，偏离了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王明甚至把“实事求是”歪曲为“狭隘的经验主义”，将其创立者称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王明所犯的错误就是典型的教条主义错误。教条主义者脱离群众和实践，不注重利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探究现实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规律。他们奉书本为圭臬，把马列书本的个别词句当教条，视俄国革命经验为教旨。他们坚持城市革命道路、城市中心论、反游击主义、所谓红军“正规化”等错误，结果使党和革命遭受到重大损失。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相伴相生，前者是后者的得力助手，二者皆属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有别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侧重于主观狭隘的经验，而非书本知识。在党的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部分实际工作者，总是醉心于自己的局部经验，轻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sup>[6]</sup>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sup>[7]</sup>的真理，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一味坚

持基于主观狭隘经验的实际主义和事务主义。

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1937年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提倡实事求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sup>[2] 296</sup>。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出了进一步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sup>[4] 801</sup>。即从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得出事物固有的规律性及其与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并以此指引我们的决策和行动。

正确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内容，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在深刻总结历史上反对“左”、右倾错误的斗争经验中逐渐形成和确立的，它不仅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理论基础，批判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且贯穿于其整个历史进程。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及其限度，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哲学范畴，“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sup>[8]</sup>人们应从自然、实践和历史的客观世界出发，不断把感性认识抽象化为理性认识，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生成逻辑，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成遵循着同样的逻辑进程。

#### 四、方式举措革命：整党整风与党的历史决议

##### （一）整党整风：党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

作为整党整风的首倡者和坚持者，建党后数十年里，毛泽东领导了党内多达十次局部性或全局性的自我整顿。其中，从土地革命时开始的整党至1961年以纠正“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内容的整

党，总共进行了7次成功的整党整风，由此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加强了党的内聚力、战斗力和适应力。而后面三次整党整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或在其中进行，算不上成功的整党。整体上看，毛泽东领导的前7次整党整风形成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理论。

首先，加强思想建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毛泽东认为，党“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sup>[9]</sup>，而党要在意识形态上掌握领导权和主导权，必须进行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即以“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sup>[4] 875</sup>因此，整党整风既是在全党集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的教育和学习活动，也是反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活动。它使中国共产党从思想理论上为未来的形势和任务做好精心准备，与时俱进地保持党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其次，加强政治建设，坚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1928年，为了突破国民党的“围剿”，推进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经济发展，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了9月“洗党”，有效解决了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地方主义和投机分子背叛等难题。延安整风是围绕解决抗日战争时期军事和经济困难开展的，以求得思想统一和抗战胜利。而1947-1948年的整党运动主要是配合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这两大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的。建国初期的几次整党整风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社会主义改造成果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最后，加强组织建设，坚持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毛泽东认为，党内的是与非、一致与分歧，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使用唇枪舌剑、拳头和刀枪粗暴解决，只能使用说理、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理性解决。

##### （二）党的历史决议：党自我革命经验的理论升华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反思理论和辩证法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省思想。

首先,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决议》总结性指出,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对照,两次革命成功与两次革命失败的清晰比较,“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sup>[4] 998</sup>;毛泽东在党的创建和发展、军队的建设与发展、民主革命的领导等方面起着旗帜灵魂的作用;革命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党建的思想、立场和方法的正确性,尤其证明了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更是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其次,始终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总结历史,既肯定了党的伟大功绩,也公开承认党自身的问题和错误。功绩是首要的,而问题与错误是次要的。《决议》认为,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是突出、首要的,但它“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在政治上“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sup>[4] 957</sup>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中央长达4年之久,严重地伤害了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即便如此,在此期间,党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和人民仍然能够坚持革命,顽强抗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决议》在结尾处明确指出:“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sup>[4] 967</sup>

最后,科学、客观地分析了党犯错的根源。《决议》坚持以实证的态度,追溯解析历史事件的本源。《决议》分析性指出,近代中国是一个农民如汪洋大海包围的国家,故绝大多数党员必然来自农民,“胆小怕事”“畏缩不前”的小农思想是农民潜意识结构,必然禁锢农民出身党员的思想,冲击党的主体意识形态。在政治路线上,他们通常无法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所需的先进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在组织路线上,他们极易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在思想路线上,更容易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错误。中国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遍布全境的国家,故“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

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sup>[4] 833</sup>他们的私利性、功利性、分散性以及精神上追求自我愉悦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左右摇摆、激进冒进、投机取巧等不好的缺点,是其经济上的动荡和现实处境的艰难的深刻反应。在组织路线上,小资产阶级很容易被唤醒其潜意识中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等错误思想,极易滋生“左”倾错误。在思想路线上,党内许多知识分子往往缺乏具体的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而走向教条主义。他们把马列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到了它,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医百病。”<sup>[4] 820</sup>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4.
-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99.
-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87.
- [6] 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43.
- [7] 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3.
- [9]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5.

[责任编辑:李成林]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软实力意蕴

刘新伟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小康社会”是人类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表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在多个方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意味着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彰显了我国强大的贫困治理能力,是新时代中国为人类减贫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将大幅提升我国在全球贫困治理事务中的话语权。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兑现了党对人民的政治承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承诺必达的良好形象,展示了党的高超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兑现了中国完成联合国减贫目标的承诺,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引下取得的成功,是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成功,展现了中国道路的生机和活力,将进一步增强中国道路的吸引力,增进世界对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认同。

**关键词:**全面小康;文化软实力;执政党形象;国家形象;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83(2020)11-0041-05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即实

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当下,即使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沉重打击,党中央、国务院仍明确表示要“坚决夺取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面胜利”<sup>[1]</sup>。目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进入收官阶段,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指标任务已经接近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胜利在望<sup>[2]</sup>。2020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必将能够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必将能够打赢脱贫攻坚战,必将能够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sup>[3]27</sup>;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具有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价值意蕴,从多方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一、中外学者关于软实力和软实力的基本观点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使其他国家追求自身所追求的能力,也叫同化力(Co-op-

**收稿日期:**2020-10-26

**基金项目:**2018年湖南省社科基金“新时代湖南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ZWA16)。

**作者简介:**刘新伟(1987-),男,汉族,河南息县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ive Power), 是相对于硬实力 (Hard Power) 或强制性权力 (Command Power) 而言的<sup>[4]</sup>。当时,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 主要是为了驳斥当时部分美国学者宣称美国衰落的言论, 驳斥他们忽略了美国拥有的强大的软实力, 进而为美国的强大作辩护。

其后, 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概念的表述, 并非始终如一, 但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始终强调文化、价值观和政策是软实力的主要来源, 吸引力是软实力的本质, 运用软实力的目的是为了对他者产生吸引, 使他者朝着自身期望的方向开展活动。2004年, 约瑟夫·奈在其著作《软实力: 世界政治成功之道》中指出, 软实力是运用吸引力而非胁迫或收买的方式达到如愿以偿的能力, 它来自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策<sup>[5]</sup>。2008年, 约瑟夫·奈在其论文《公共外交与软实力》一文指出, 软实力指个人通过吸引力影响他人获得自身期望结果的能力<sup>[6]</sup>,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来源于其文化、价值观和政策。2009年, 约瑟夫·奈在《智慧之道: 软实力与硬实力相结合》中指出, “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获得期望结果的能力”,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政策<sup>[7]</sup>。

1993年, 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王沪宁把“Soft Power”译为“软权力”<sup>[8]</sup>, 由此, 软实力概念在中国被广泛使用, 在译名上逐步固定为“软实力”。软实力理论传入到中国后, 中国学者特别突出强调文化因素在软实力中的作用, 提出了文化软实力 (Cultural Soft Power) 概念。2005年, 在浙江省工作时, 习近平总书记就使用过“文化软实力”的表述<sup>[9]</sup>;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党的报告中首次使用“文化软实力”概念。

湖南大学张国祚教授认为, 软实力具有“吸引、凝聚、感召、动员、说服、诱导、感染、共鸣、同化等非强制性的影响人心的作用”<sup>[10]</sup>。能够影响人心的因子, 归根结底是文化, 区别不过在于不同的文化形态罢了, 有的是给人精神享受的文化产品或文化作品, 有的是令人折服的先进思想理论, 有的是完备的国家制度等。软实力的全部功能都可以归结为是文化的功能。也正因为此, 张国祚教授主张, “文化在软实力中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是软实力的灵魂和经纬。”<sup>[11]</sup>

结合中外学者关于软实力或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论述, 可以看出软实力 (Soft Power) 是相对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 (Hard Power) 而言的, 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国家运用除收买和胁迫以外的手段 (主要是吸引力和影响力), 使他者做如己所愿的事情的能力。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 无论是政治价值观, 还是国家的内外政策, 都体现了文化的属性, 都可以归结为文化。文化软实力, 简言之, 就是指一国基于自身文化资源所产生的对受众的吸引力、同化力、影响力、感召力、向心力等作用。这里的文化资源指一切具有文化属性的资源的总和, 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 (电视、电影、动漫、音乐等)、国家制度 (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等)、国家内外政策 (社会治理、移民政策、外交战略等) 等内容。执政党形象、国家形象、发展道路、国际话语权等是对外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软实力意蕴

2013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sup>[12]</sup>。事实上, 不仅国家文化软实力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也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二者是良性互动关系, 相得益彰。硬实力的上升要求有相应的文化软实力与之相匹配,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经济等硬实力作为支撑。没有经济的繁荣发展, 是无法彰显国家发展道路的吸引力的; 没有对世界的突出贡献, 是无法展示良好国家形象的; 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创新话语体系的构建, 是无法争夺和掌控国际话语权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仅会显著增强我国经济、科技等硬实力, 还将显著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包括我国在全球贫困治理中话语权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全方位、立体呈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吸引力的增强, 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世界认同等。

(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将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阐释好中国特色”<sup>[12]</sup>。“小康社会”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创新, 是人类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表达。“小康”一词最早出自我国儒家经典《诗经》, 《诗经·大雅》中有“民亦劳止, 汙可小康”这样的诗句, 表达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安定生活的无限向往。儒家另一部经典《礼记》对“小康社会”有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今大道既隐, 天下为家。各亲其亲, 各子其子, 货力为己……礼义以为纪, 以正君臣, 以笃父子, 以睦兄弟, 以和夫妇, 以设制度, 以立田里……是谓小康。”在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体系中, 大同社会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最美好的社会, “小康社会”是仅次于“大同社会”的美好社会, “小康社会”表达了古代劳动人民对社会安定和谐, 人民生活富足的向往。

新中国成立后, 邓小平同志赋予了“小康社会”新的内涵。1979年12月,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 邓小平用“小康”“小康之家”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 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 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 而是‘小康之家’。”<sup>[13]</sup>1984年, 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 “所谓小康, 就是到本世纪末, 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sup>[14]</sup>这样, “小康”就被用来指称中国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后的生活水平。也正因为邓小平同志赋予“小康”新的内涵, 这个中国古老的词汇被国内外广泛使用并传播开来。1987年, 党的十三大报告把基本实现小康作为“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要实现的目标。1997年,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在21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12年,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也即确定为党的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

无论是代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 还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实现的“现代化”, 这些话语都不是中国原创话语, 都是被翻译的外来话语。尤其是“现代化”这个概念, 堪称强势话语, 一度被认为实现“现代化”就是过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所谓美好生活, 实现现代化只有走西方资本主义一条道路。使用我国本土话语“小康社会”来表达中国人民向往的的美好生活, 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 有利于增强我国对外话语的感召力, 有利于讲好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中国故事, 有利于争夺和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sup>[15]</sup>。千百年来, “小康生活”“小康之家”“小康社会”等话语一直被广为使用, 表达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小康”“全面小康”, 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人民追求的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表达, 这些话语来源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彰显了我国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国际社会在关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成就和先进经验的同时, 必将关注“小康社会”这一话语背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 这将进一步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我国文化软实力。

(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将进一步展现中国社会主义大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自人类社会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数千年间, 绝对贫困问题始终困扰着世界各国, 包括古代中国的所谓盛世和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 都未能成功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 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提出精准扶贫战略, 主张“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战略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方案, 再实施以来,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 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sup>[16]</sup>。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 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以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这意味着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彻底消除千百年来人们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

仅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现脱贫的贫困人口就高达近一亿人<sup>[17]</sup>,这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总人口数量,这个成就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难以做到的,这彰显了我国强大的贫困治理能力,也必将极大提升我国在全球贫困治理中的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sup>[3]11</sup>。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成功实现8亿左右人口脱贫。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间,全世界实现脱贫的人口百分之七十在中国实现脱贫,中国为世界脱贫减贫贡献率高达百分之七十,比其他国家实现脱贫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成功实现近一亿人口整体脱贫,这就是新时代中国为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我国为世界扶贫减贫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更是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大计、为世界人权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sup>[12]</sup>我国巨大的脱贫减贫成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指引下取得的。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这展示了新时代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进一步坚定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sup>[17]</sup>。即使面对突如其来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沉重打击,习近平总书记仍然强调:“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sup>[17]</sup>

执政党兑现自身执政承诺是执政党取信于民,建立自身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是获取人民拥护和支持的重要方式,是执政党维持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方式。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在建党一百

年时,全面实现小康。2012年,党的十八大做出庄严承诺,要在建党一百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中国共产党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起(2002年),到领导全国人民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期间历经近20年,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始终不忘承诺,始终孜孜以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实践中兑现的众多政治承诺中的一个,未来还有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更加宏大的目标和承诺。2020年底,我国必将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将消除现行标准下我国的绝对贫困,将兑现党的承诺,这必将更加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全国人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值得中国人民托付的,是值得中国人民信赖的,是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这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将更加坚定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自信,更加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自信。

(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进一步增强中国道路的吸引力

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和体制机制)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发展道路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中国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就始终如一地沿着既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奋勇前进取得的巨大成功,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这将进一步增强中国道路的吸引力,增强中国道路的国际关注和认同,彰显中国的强大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辛的探索成功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已经被证明是正确道路,还将继续指引中国夺取全面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胜利。党的十七大报告完整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准确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sup>[18]</sup>。中国道路开创了通往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模式,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和重要借鉴。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目标之前先设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也将会成为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条重要国际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同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必将越走越宽,越发显现中国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 三、结语

踏平坎坷成大道,重整行装再出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的第一个百年目标,还有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等更宏伟的目标等着我们去实现。随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目标的逐步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同频共振,相得益彰,同步实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让我们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尽情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20-02-06(1).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 人民日报. 2020-11-04(1).
-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4]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J]. Foreign Policy, Issue 80, Fall 1990: 166.
- [5]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Preface, 2004.
- [6] Joseph S. Nye Jr.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Vol. 616(1): 94-109.
- [7] Joseph S. Nye Jr. . Get Smart: Combining Hard and Soft Power [J]. Foreign Affairs, 2009, Vol. 88(4): 160-163.
- [8] 王沪宁. 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 软权力[J]. 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3): 91-96, 75.
- [9]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149.
- [10] 中国软实力建设必须回答的几个重要问题 [J]. 科学社会主义, 2015(5): 7-10.
- [11] 张国祚. 中国软实力研究论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62.
- [12] 习近平.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 人民日报, 2014-01-01.
- [13]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37.
- [14]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513.
- [15]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N]. 人民日报, 2014-10-14 (01).
- [16] 黄承伟. 脱贫攻坚伟大成就彰显我国制度优势来源[J]. 红旗文稿, 2020(8).
- [17] 习近平.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03-07(02).
- [1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9.

[责任编辑: 高雯婷]

# 大数据时代下推进智慧社区建设问题研究

## ——以合肥市为例

胡厚翠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 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 大数据时代下, 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智慧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层或物理设备层、数据库层或信息储存、交换处理层、公共数据专网或信息传输层、业务应用层或信息展示层等方面的主要内容和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等主要应用技术。当下, 合肥市在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实践中,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即数据融合共享度不够; 岗位要求高, 人才缺口比较大; 上下联动缺乏, 整体推进不均衡; 供给内容方式和参与主体多元性不足等。因此, 为进一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 合肥市应针对当前智慧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不断探索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路径。

**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 智慧社区

**中图分类号:** D6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20)11-0046-07

### 一、大数据时代下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现实意义

#### (一) 传统社区管理模式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 城市管理趋于社区化, 大量社会事务回归社区。同时, 人们对社区服务、物业管理、社区安防、居住环境、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 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迫切需要转型发展。而当下,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 大数据技术(如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等)的出现为传统社区管理模式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城市、社区、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 而在人的活动过程中, 无时无刻不在产生数据。传统社区管理中信息化系统是独立的、局部的, 信息之间是不能互相交融的, 而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将社区活动中产生的数据信息资源互联互通起来。这就打破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壁垒, 通过数据之间的互相交融, 把它们的价值充分挖掘出来, 从而提升数据的信息价值, 最终服务于人民群众。通过对这些数据

**收稿日期:** 2020-09-30

**基金项目:** 2020 年安徽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课题“大数据时代下的智慧社区建设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QS202040)。

**作者简介:** 胡厚翠(1977-), 女, 安徽巢湖人,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 公共管理。

价值的充分挖掘,最终对社区人民群众的服务将更加精准、更加个性化<sup>[1]</sup>。

### (二) 提升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有力举措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大数据技术支撑下,社区可以,利用数据信息,为居民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如利用人口普查信息,可以重点关注有老人的家庭,老人状况的数据可以为政府、养老机构、企业等决策布局提供精准服务指导;居民也可以随时随地地将社区存在的问题反馈给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对社区内的座椅、垃圾桶或其他公共设施贴上一个二维码)提交自己的问题,服务机构可以通过后台及时进行处理,从而提高社区的服务效能<sup>[2]</sup>。

### (三) 实现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实行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居民的基层民主自治。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国家与社会管理的主要做法多数是以政府主导为主,社会公众多数是服从与听从政府的管理安排。但是近年来,伴随改革开放和民主意识的逐步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公众民主意识逐渐提高,但是总体来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能动性还没有被完全激活。而在大数据技术背景下,这种局面将会发生质的变化。每个社区利用数据的整合,可以搭建社区的综合服务信息平台,通过此平台不同主题或议题的设计,可以让全体社区多元社会公众参与到本社区主题或议题的公共讨论、公共沟通、公共对话、公共监督等,从而形成本社区的基本共识。同时,这些基本共识的形成,可以倒逼基层社区管理者不得不回应,进而加速基层民主自治的发展进程<sup>[3]</sup>。

## 二、大数据时代下智慧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

### (一) 大数据时代下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通过对智慧社区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2014年

以来,学者们高度关注智慧社区建设的总体框架和功能展现等内容(见表1)。虽然大家的观点有所不同,各有侧重,但是我们仍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 数据采集层或物理设备层。数据采集层,是智慧社区的数据来源,通过对社区各个系统所产生的各类数据的收集、存储,形成基础数据。在智慧社区的建设过程中,物理设备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该环节涉及到大量信息采集设备,如摄像头、视频电话、呼叫终端、移动设备等;存储设备,如存储服务器、文件服务器等;网络交换设备,如核心交换机、分发交换机等内容。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涌入社区的新设备、新系统将会更多。这些物理设备的配备是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如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工作终端上传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民情民意;网格综合执法人员上传执法文件;社区的医疗服务人员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信息进行采集,并且上传到相关系统等。

2. 数据库层或信息储存、交换处理层。数据库是智慧社区数据的存储中心和交换中心,智慧社区各个系统的数据通过数据库进行存储和交互。信息储存、交换处理层是数据库中的核心部件,可实现各个单元数据的中转,并对数据进行挖掘与筛选。在这个阶段,提供PaaS结构技术服务和PaaS结构技术服务,前者保证数据交互效率的分布式队列服务、保证数据有效采集应用的数据挖掘服务、保证数据分析科学可靠的智能分析服务等,后者构建除了数据库外的商业智能、分布式关系数据库、非关系数据库等内容,以保证数据的合理存放、高效应用等。

3. 公共数据专网或信息传输层。公共数据专网是智慧社区数据传递的关键,各种数据的获取、查询、发布和互联以及应用系统的处理结果等均需要通过专网实现。信息传输层是信息传输的主要通道,为各个单元提供了必要信息流动流通,主要包括广播电视局和公安局专用网络、电信运营商的因特网络、社区自身的局域网等。

4. 业务应用层或信息展示层。业务应用层或信息展示层就是对社区提供的所有数据进行汇总、分

表1 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时间	作者	主要内容
2014	李志清	一个平台(智慧社区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二个载体(社区服务站和智慧家庭)、三个基础(信息基础设施、空间基础数据及管理“智慧社区”和使用“智慧社区”的人)、四大支柱(智慧社区标准体系、智慧社区管理体系、智慧社区核心技术、智慧社区政策法规) <sup>[4]</sup> 。
2014	肖凌、王若舟等	智慧物业、智慧家居、智慧政务、智慧医疗和智慧商务 <sup>[5]</sup> 。
2015	张平、贾晨阳	智慧物业、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安防 <sup>[6]</sup> 。
2016	曹雪彦、郑保清	智慧社区管理、智慧养老、智慧家居 <sup>[7]</sup> 。
2017	能艳兰、李燕	智慧物业、智慧安防和智慧民生(医疗、养老、家居) <sup>[8]</sup> 。
2018	董云峰、张宏伟等	物业管理领域、电子商务领域、养老领域、家居服务领域、智慧教育领域、智慧医疗领域 <sup>[9]</sup> 。
2019	葛涵涛	智能家居、智慧楼宇、社区场景、智慧物业 <sup>[10]</sup> 。
2019	王亚晶、张永艳	将智慧社区划分为信息展示单元(智慧物业、智慧家居、智慧家政、智慧医疗等)、信息储存、交换和处理单元(信息的主要“仓库”)、信息传输单元(广播电视局和公安局专用网络、电信运营商的因特网、社区自身的局域网等)以及信息采集单元(安防监控设备、水电暖监控设备、身体状况监测设备、火灾报警器、门禁设备等) <sup>[11]</sup> 。
2019	周婕、周扬帆	智能物业管理、电子商务服务、智慧养老服务、智慧家居 <sup>[12]</sup> 。
2019	马磊	社区监控管理、社区安防系统、电子信息屏系统、社区医疗系统、养老服务、物业管理 <sup>[13]</sup> 。
2019	王思聪	智慧社区的基本组成包含传感器层、公共数据专网、应用系统、综合应用界面和数据库等。智慧社区的建设探索建立以“智慧安防”“智慧管理”“智慧生活”为核心的智慧楼院新标准 <sup>[14]</sup> 。
2019	苏云、陆泽明	智慧社区的总体架构:物理设备、数据管理平台、服务支撑、业务应用。其中业务应用包括:健康社区(社区医疗、居家养老)、平安社区(社区安全监控、流动人口管理)、和谐社区(综治维稳信访、舆情监测分析)、智慧政务(社区事务服务、政务决策支持)、温情社区(物业管家、家政服务)、教育社区(社区家长通、民族语言教学)、商务社区(民族商城) <sup>[15]</sup> 。
2019	黄佳君	在线办公模块、公共服务模块、政策宣传模块、社区党建模块、民主议事模块、社区动态模块、投诉建议模块、公益服务模块、网上缴费模块、生鲜配送模块、生活服务模块、物业系统模块 <sup>[16]</sup> 。

析,并实现最终的业务展现,通过平板电脑、手机等终端将功能展示给用户。智慧社区在功能展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涉及到方方面面,如智慧物业、智慧商务、智慧家居、智慧政务、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安防、智慧养老、智慧家政、智慧党建等,社区在这些领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空间。

(二)大数据时代下在智慧社区建设中涉及的主要应用技术

通过对智慧社区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当前大数据时代下的智慧社区建设主要涉及到以下几种应用技术的应用和运用(见表2)。具体为:

1. 物联网技术。物联网是与互联网结合形成一个巨大网络。这个无线网既可以超越时间,也可以跨越空间,并且网络中的连接设备可以成百上千,其范围可以囊括人们生活的绝大部分,比如说家庭、办公、购物、娱乐、医疗健康等。物联网这一强大的网络可以随时随地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机的互通,促进实现现实世界数字化的进程。

2. 云计算技术。在智慧社区中有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综合信息平台的搭建,这个平台的搭建主要就是运用了云计算技术,从而实现了数据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业务协同,使得综合信息平台中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得以整合利用,最大范围内发挥好信息资源的价值。这也是业务应用层或信息展示层功能得以展现的重要技术支撑。

3. 大数据技术。一般来说,大数据可以起到以下作用:一是发现规律,提前预感知。社区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收集整理,能找到数据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发现其背后的规律性,可以预先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二是智能辅助,动态监测。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开发,社会正在逐渐变得可计算,机器通过对大量数据的计算,可以自动辅助人类完成动态监测等一系列智能任务。三是跟踪信息,及时反馈。随着数据量的不断沉淀,大数据可以全过程监督决策,及时给予反馈信息,及时纠偏,如对手机APP一定时间的数据抓取,就可以区别其为小区居



表2 智慧社区建设中的主要应用技术

时间	作者	主要应用技术
2014	肖凌, 王若舟等	云平台技术 <sup>[5]</sup>
2017	朱琳, 万远英等	大数据技术 <sup>[3]</sup>
2018	赵松君	大数据技术 <sup>[1]</sup>
2018	舒慧欣, 刘仕琴等	大数据技术 <sup>[2]</sup>
2019	葛涵涛	运用 AI、IoT、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 <sup>[10]</sup>
2019	王亚晶, 张永艳	5G 技术 (第五代移动电话行动通信标准) <sup>[11]</sup>
2019	周婕, 周扬帆	物联网 <sup>[12]</sup>
2019	苏云, 陆泽明	移动互联网技术 (移动互联 APP) <sup>[15]</sup>
2019	马磊	物联网技术, 云计算技术 <sup>[13]</sup>
2019	赵岩	物联网技术 <sup>[17]</sup>

民还是非小区居民, 其呈现给两种用户的服务信息内容就不一样, 以此来保护社区信息安全等。

### 三、大数据时代下合肥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困境

通过对合肥市相关智慧社区的实地调研发现, 合肥市在智慧社区建设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仍然存在以下诸多问题。

#### (一) 数据融合共享度不够

目前, 合肥市社区使用的各类信息平台平均达到 37 个。一是信息部门化、碎片化等问题突出。社区工作人员承担大量党建、民政、公安、卫计等各垂直条线下发的数据采集、台账梳理上报等例行性工作。由于各个单位对社区的工作要求不同、收集的信息不同, 需要社区工作者采集大量重复性、不共享的数据, 并且要把数据录入到不同的平台中。二是信息系统技术架构和数据结构互不兼容问题。这将导致基层在前台综合受理后, 难以实现后台协同办理。系统间业务割裂、数据格式不统一、数据准确性不足、信息流转不协调、信息获取较被动等问题较为明显, 为社区服务管理带来不便。三是信息共享整合难度较大。根据实地调研的情况, 合肥市正在对社区目前在用的 35 个信息系统进行技术融合共享工作, 当下已经能实现对其中 8 个系统的融合共享。建设社区融合平台, 按照用户、数

据、业务“三个融合”的总体思路, 推进社区融合平台建设。从社区层面来说, 也在逐步完成社区专题库建设, 这样实现市级大数据中心与社区融合平台的互联互通。目前, 这项工作需要加快速度, 也需要寻求更高技术支撑。

#### (二) 岗位要求高, 人才缺口比较大

一是“智慧社区”的打造, 对工作人员的知识要求比较高。如前所述, 大数据时代下的智慧社区建设需要一定的信息应用技术 (如云平台技术、大数据技术、物联网等) 作为支撑。虽然当下多数社区都是通过第三方信息技术公司的技术人员作为信息人才支撑, 但是智慧社区人才支撑需要的不仅仅是纯粹的信息技术人员, 同时需要掌握一定的行政管理知识, 需要的是一种综合性的人才。他们不仅要求掌握一定的信息技能和应用能力, 而且还要求他们具备相当的人文素养, 以便更好地在社区开展服务工作。二是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发展, 外来人口不断激增。相应地, 社区居委会管理幅度也会不断增加, 其工作量任务随之增大。每个社区工作人员都要应对很多的工作任务, 工作量超负荷, 精神压力大。新聘用工作人员现代办公技术应用熟练, 但是其工作待遇不高、人才激励政策不够完善等, 导致真正适应智慧社区建设方面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很难扎根社区。三是老社区工作人员, 有做群众工作的经验, 但其自身文化水平不高, 接受新事物、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不足, 对电脑等一些现

代办公技术使用不熟练，又由于基层社区资金的相对缺乏，对他们有针对性的培训不到位，导致智慧社区建设急需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

### （三）上下联动缺乏，整体推进不均衡

一是体制机制不健全，上下联动不足。智慧社区建设统一领导体制和综合统筹机制尚未形成，与基层治理相关的信息化项目开发建设多头无序，缺乏统筹。目前，包河、蜀山、庐阳等区均启动基层治理信息化综合平台建设，部分街道、社区也从不同领域开展智慧社区探索，其标准、规范均不统一。如以网格化平台为例，庐阳区三孝口街道在“庐阳区智慧社区管理服务平台”里面；高新区天乐社区在“一网清”社会治理平台里面；包河区方兴社区在“方兴社会治理一体化智慧服务平台”里面。它们实质都是网格化管理方法，但是名称、平台里面的功能都各不相同，这将会给后期的融合共享带来新的障碍，最终造成重复建设、资金浪费等问题。二是各市区智慧社区发展各具特色，总体呈现推进不均衡特点。如三孝口街道因为其自身地理位置的原因，地处市区核心位置，人口密集，其更关注社区管理服务，其对社区网格员的管理非常严格，通过智慧社区平台的建设，改变过去社区网格员坐在办公室办公的局面，让其走出办公室，主动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问题，做实基层网格工作。高新区天乐社区重点关注两大平台建设（“一站通”“一网清”），抓好基层政务服务和基层信息采集工作，“一网清”平台重点就在于采集居民的基础信息工作。包河区方兴社区信息化平台发展相对成熟，已经发挥出与基层居民之间的互动作用，通过微信公众号，居民可以获得很多的智慧民生服务。三是智慧社区建设的资金来源不统一。在调研中发现，智慧社区建设涉及到多个部门，如民政部门、公安部门、物业公司等，其建设资金的来源也是多元的，有时也有省级资金和驻区单位资金支持等。这样，资金的多元也会影响各市区的发展均衡性。

### （四）供给内容方式和参与主体多元性不足

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发现智慧社区建设中，政府、个别企业的积极性相对高于社居委、社会组织与居民。究其根源：一是理念定位不够清晰。合肥

市智慧社区《规划》中对“11143”总体架构有了清晰的表述。在对智慧社区建设的规划设计时，相关部门对政府、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的需求都进行了相应收集。但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不管是居民，还是社区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对其《规划》中的“智管社区”“效能社区”“宜居社区”“平安社区”等概念理解不够精准。不可否认，目前合肥市社区在“智管社区”和“平安社区”这两项智慧应用上面工作成效明显。二是居民个人信息风险意识增强，收集个人信息难度加大。以大数据为特征的数据库是智慧综合信息平台的一个核心内容，社区工作人员需要不断收集居民的个人信息来支撑数据库的运行。由于当下个人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不够健全等，基层社区“一网清”平台收集到的个人信息需要加大防护力度以及加固平台的网络防火墙功能，防止出现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三是参与主体单一。表面上看，社区服务平台上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但是除了政府或企业之外，其他多元主体，如服务商、广告商、志愿者、居民、居委会、社会组织等，其民主参与的意识并不强，互动积极性并不高。四是供给方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供给的内容方式单一。由于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等少量建设主体参与建设其中，使得真正的理想化的多样化的社区服务功能没有很好地得以体现，提供的智慧设施、智慧服务应用模式等都单一，缺乏差异性。最终的结果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项目依然占主要地位，多元化的社会合作共治机制并没有真正形成。

## 四、大数据时代下合肥市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路径

### （一）加速社区融合平台建设，提升数据的融合共享

一是加大和统一智慧社区的财政投入渠道。主要是向财政追加预算，继续配备一批信息化、智能化的设施设备，完善各社区的信息系统。避免各市区由于资金的问题，影响智慧社区建设的质量水平。二是加强常态化数据资源体系建设。建立完善的社区数据采集和更新、维护与应用机制，实现对

社区“人、房、事、物、情、组织”等信息的全面汇聚、多方共享。以社区现有房产数据为基础,以合肥市数据中心中人口库、法人库、电子证照库、地理信息库为辅,通过综合比对互补更新数据,再汇集分析各个业务平台数据,最终完成社区治理数据库建设。三是打造社区融合平台。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基层社区在使用的信息化系统平均多达80多个,存在严重的“信息孤岛”现象。社区工作人员要不断地重复录入信息,它们在试点时只能实现社区层面的融合,其对外与市直部门、其他市政部门等均无法互联互通。这些都迫切地需要对平台进行系统的整合,主要是实现数据融合、技术融合与业务融合,如打通公安、民政、社保、城管等部门数据以及小区物业、智能安防、市政服务、社会服务机构等信息系统,减少社区工作者对各信息系统的重复录入率,进而提高其工作效率。

(二) 强化社区人才队伍建设,有效提高信息化应用能力

一是形成人才引进奖励机制。从全国吸引智慧社区建设人才,并保证让这些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有成就。二是建立与相关高校的联动合作机制。推动本地高校开设与智慧社区建设相关的专业,定向培养具备相关技术水平、管理才能、人文素养等多方面能力的学生,进行社区创新创业的引导和培养,为本地智慧社区建设做好人才储备工作。三是建立社区治理学校。合肥市包河区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培训的做法值得大力推广,有效提高社区工作者的信息化应用能力,确保智慧社区的建设及应用的发展。四是建立有第三方专家组成的决策咨询委员会平台机构。加强对智慧社区建设的辅导、咨询,提供更多的知识、信息和国际比较等决策参考信息。

(三) 强化社区体制机制建设,大力推进顶层设计的有效落实

合肥市积极响应国家建设智慧社区的号召,陆续出台《加快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指导意义》《合肥市新型智慧城市三年行动计划》《规划》等一系列文件进行部署推动,特别是《规划》这一顶层设计,智慧社区的“11143”总体架构非常明晰。为了让这一总体架构得以有效落实,合肥市采取了一

系列的有力举措,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体制机制不畅的问题。今后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建立智慧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对智慧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收集,并及时处理。二要充分结合社区现有资源,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形成智慧社区信息服务平台,使信息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合理利用。同时,要充分对接社会信息资源,并加以充分利用,减少财政资金的压力,进而促进社区管理服务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三要做好合肥市智慧社区建设的相关配套工作,如各市区信息化平台建设标准的统一性,特别是对信息平台中的相同功能要做好标准化的工作。

(四)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努力营造社区共同体意识

一是利用各种方式多宣传。利用微信公众号、博客、社交平台、小视频等手段推广、普及智慧社区建设的相关知识和建设进度。其中针对青年人要重点宣传推广,由他们对其家庭中的老年人和小孩再宣传推广,这样效果会更好。二是智慧社区APP等运行平台操作上要尽量通俗易懂。智慧社区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惠及所有居民(包括老人和小孩),所以在智慧平台的操作菜单等方面要充分考虑这一点。三是营造社区共同体意识。通过多种渠道让大家对社区有一个“社区共同体”的认识,激发他们参与活动的热情,特别要引导他们关心社区的公共事务,提高他们对社区的和谐感、信赖感和归属感等<sup>[18]</sup>。

(五) 建立安全保障体系,大力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一是建立安全保障体系。将安全保障与智慧社区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社区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为数据的交换和共享提供标准、安全的数据交换规范,防止居民的隐私信息泄露。二是制定完善的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针对当前数据信息开放和数据挖掘责任的不明确性,社区居民担心个人隐私信息的暴露问题,国家层面要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在当下国家层面法律法规没有出台的前提下,需要政府层面与相应企业之间签订相应保密协议或诚信承诺书等。三是大力培养社区居民个人数据隐私保护意识。政

府要切实履行对公权力机构在使用和挖掘个人数据时的监督义务,对可能泄露个人数据信息的情况要及时予以制止。对个人数据再利用时,要设定风险类别,对个人数据的风险进行科学的合理评估评测,防患于未然,高度加以重视。

(六) 创新社区建设运营模式,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共治

一是构建多元化社区建设运营模式。根据发展实际,利用广泛的技术、智力、资本、政策资源等,由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向服务企业主导型、政企合作型、综合参与型等多元参与方式转变。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或者完全委托等方式来对智慧社区综合服务信息平台的应用进行管理;也可以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贷款援助等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智慧社区建设,不断拓展智慧社区服务领域。二是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机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政府或企业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内容方式过于单一,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智慧社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合作共治,而当前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社区居民的力量尤其缺失,只看到政府、少数企业、少数社会组织的身影,企业市场化进程缓慢,社区居民对智慧社区建设项目的关注、支持及参与程度不高。由此,有必要不断壮大社区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的服务功能和采取有效措施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共同提升社区建设的智慧化水平。

#### 参考文献:

- [1] 赵松君. 大数据在智慧社区中的应用及发展[J]. 科技前沿, 2018(2):154-156.
- [2] 舒慧欣,刘仕琴,等. 大数据技术下的智慧社区建设与运行 [J].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2018(23):142.
- [3] 朱琳,万远英,等. 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J]. 长白学刊, 2017(6):118-124.
- [4] 李志清. 广州建设智慧社区的应用研究 [J]. 物联网技术, 2014(12):79-81,83.
- [5] 肖凌,王若舟,等. 云平台助力智慧社区建设 [J]. 光通信研究, 2014(3):18-20.
- [6] 张平,贾晨阳. 我国智慧社区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J]. 人间, 2015(29):14-16,19.
- [7] 曹雪彦,郑保清. “互联网+”背景下石家庄市“智慧社区”建设研究 [J].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 2016(7):45-46.
- [8] 董云峰,张宏伟,等. 互联网+背景下智慧社区的技术实现[J]. 湖北农机化, 2018(4):34-35.
- [9] 能艳兰,李燕. 智慧城市背景下的社区智慧化研究[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7(22):201-202.
- [10] 葛涵涛. 构建智能物联时代的智慧社区[J]. 上海信息化, 2019(4):52-55.
- [11] 王亚晶,张永艳. 基于5G的智慧社区管理系统 [J].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2019(13):5.
- [12] 周婕,周扬帆. 物联网与智慧社区服务体系的融合探索[J]. 经济师, 2019(8):242,244.
- [13] 马磊. 智慧城市社区信息化解决方案——智慧社区规划方案 [J]. 通信电源技术, 2019(1):240-241.
- [14] 王思聪. 基于信息技术的智慧社区整体框架和功能实现[J]. 科技视界, 2019(23):35-36.
- [15] 苏云,陆泽明. 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智慧社区应用功能设计研究——以兰州市西园街道为例[J].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9(5):24-30.
- [16] 黄佳君. 关于构建“互联网+社区治理”新模式的探讨——以南宁市“智慧南湖”平台为例[J]. 企业科技与发展, 2019(10):106-108.
- [17] 赵岩. 智慧社区解决方案探讨——物联网时代的智慧家园 [J]. 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 2019(6):68-70.
- [18] 张鹏. 智慧社区公共服务治理模式、发展阻碍及整体性治理策略 [J]. 江淮论坛, 2017(4):70-76.

[责任编辑:于洋]

# 区块链技术在解决智慧城市体系架构中的应用

芦升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 哲学与文化教研部, 辽宁 大连 116013)

**摘要:** 随着城市产业链不断改革和不断升级, 建设并发展智慧城市是新时代背景下每一座城市规划的必然结果。2018年10月3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 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在构建智慧城市的蓝图中, 除了人工智能体系、物联网体系之外, 区块链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区块链技术因为去中心化、分布式系统、自动化运行的可编程合约脚本系统等特点, 使得区块链将在工业、商业、医疗服务、城市公共服务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广泛运用, 提升智慧城市效率, 强化城市数据的独立安全性。

**关键词:** 智慧城市; 人工智能; 物联网体系; 区块链技术

**中图分类号:** F29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20)11-0053-05

## 一、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自2010年智慧城市的概念被提出之后, 物联

网和云计算几乎成为了智慧城市的代名词, 甚至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智慧城市几乎就是建立在网络上的一座未来城市, 依托万物互联收集海量数据, 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来主导城市的发展。

然而, 随着智慧城市体系不断被清晰化、模拟化和实践化, 新的问题也在不断地被发现和延伸, 智慧城市体系的建设和管理也遇到了新的问题。现阶段智慧城市的建设是在原有的互联网设施和新兴的物联网设施的基础上完成架构的, 虽然可以实现一些设想的功能, 但是相比智慧城市生态建设依然是相去甚远。

现阶段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仅仅完成了数字化, 相较于理想中的数据化还有很大的差距, 一方面是因为智慧城市的建设起步时间不久, 对于城市各方面的数据采集和分析都还不够完善, 没有详尽的数据库就无法完成准确的数据化;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物联网集成化程度不高, 成熟度不够, 各个平台在系统协同运作、数据交换、数据加密保护等方面与智慧城市生态的建设预想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些问题就导致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体架构出现了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只依靠软件技术的创新和软件生态的升级是远远不够的, 不同的硬件设备和

**收稿日期:** 2020-09-22

**作者简介:** 芦升(1978-), 男, 黑龙江大庆人,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大连行政学院、大连市社会主义学院)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 研究方向: 当代科技发展趋势。

软件生态之间的协同不足必然会大大降低数据交换和运算的效率，这就有悖于智慧城市生态建设的初衷。最直接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对硬件设备的底层协议进行彻底升级，而区块链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技术。

## 二、区块链技术的特点及运用

### (一) 技术特点

区块链是一种新型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该技术结合了分布式数据存储、共识机制、密码学加密算法技术等应用模型<sup>[1]</sup>。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在底层网络架构上根据共识机制的协议完成网络节点的数据交换，将相关的数据记录在区块当中，并按照时间顺序将已经储存的数据合成为一种链式数据结构，然后以密码学的加密方式对数据加密以保证数据不可被篡改和伪造，从而大大提升网络数据交换过程中的安全性<sup>[2]</sup>。

区块链技术有以下几个特点，即去中心化、开放性、自治性、信息不可篡改、匿名性<sup>[3]</sup>。

第一，是去中心化。互联网生态发展的前期是以中心化为主，数据中心化和计算中心化是网络生态的特点。然而随着大数据和共享时代的到来，网络生态必须要打破原有的边界，完成去中心化的演变，这不仅要求数据中心要有足够的容错能力，而且要求共享数据得到足够的安全保障。然而以传统的网络技术构建新型网络内容和数据生态显然是达不到要求的，而区块链技术因为分布式存储和节点之间自由连接并且高度自治的特点，是去中心化网络生态建设中安全性最强、效率最高的新型技术。

第二，是开放性。除了对信息交换方的私有信息进行加密，区块链数据是可以通过公开的接口被查询的。因为系统的开放性，开发者就更容易在区块链系统协议下开发出更多相关的应用，并且能够和源系统更好的协同运作，大大提升效率。智慧城市对多个系统之间的协同运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区块链技术将会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第三，自治性。高度规范化和公开透明的智能

算法，让区块链具备了自治性特点。传统的互联网设备以及一些新型的物联网设备在交换数据的时候，都必须在遵循相关协议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就对开发者和供应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旦底层协议升级，授权管理出现问题，数据交换必然会被终止，甚至会被篡改。区块链因为采用统一的规范和协议，使得每个系统中的所有节点都能在信任的环境中完成自由高效并且安全的数据交换，将数据交换所采用的信任规则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变换为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任，系统与系统之间的信任，从而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大大提升了数据交换的效率，解决了传统互联网和物联网数据交换的弊端。

第四，信息不可篡改。一旦某项数据被添加到了区块链，数据就会被永久的保存在区块链当中。又因为去中心化的特质，从单个节点上对区块链中的数据是无法随意篡改的。相比传统互联网的数据存储技术，区块链上存储的数据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时序性和安全性。正因为如此，在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依托的智慧城市时代，数据运算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才得到了保障。

第五，匿名性。每个系统之间通过数据节点完成数据交换的过程中，都遵循统一的协议和固定的交换算法，所以无需进行二次授权或者读取数据交换方的身份信息，就可以完成数据交换。这样的方式既做到了保护隐私也做到了高效完成数据交换的任务，同时各个系统之间的协同性也会更高。

### (二) 技术的迭代与运用

在区块链技术刚刚兴起的时候，因为其分布式管理的特点被以分布式记账系统的形式运用在数字货币的交易中，即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进行点对点数字货币交易的记账管理。

区块链技术升级的一个关键是智能合约的提出，这使得区块链获得了人工智能的特性。因为智能合约具有可编程性和时间触发的特点，所以区块链技术被运用到了物联网中，为万物互联网提供便捷可靠的服务，与此同时衍生出了新型区块链系统，实现了自动化运行的可编程智能合约脚本。该

系统被广泛运用于金融系统、供应链体系和工业制造中。

区块链技术最值得期待的前景是推动全场景智慧管理体系的发展。智慧城市是一个分布式全场景多系统的智能化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数据采集、数据交换、数据存储、数据运算和数据传输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因为智慧城市的体系本身就是建立在海量的数据之上，云计算、5G、自动化等都是智慧城市体系搭建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这其中区块链技术将作为核心的底层技术，为用户、公有化智能系统、定制化智慧系统、智能化业务系统提供最安全、最高效、最便捷的数据交换和存储方式，推动智慧城市体系的基本运转，实现高效率、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运行的城市管理体系，合理并充分利用城市资源，提高城市发展的整体效率，提升市民生活和幸福度。

### 三、区块链技术助力智慧城市体系搭建

智慧城市体系包括了定制化用户系统、公共智能系统和智能化业务系统。每一个系统都是不同的，每一个系统都有各自的功能，想要三个系统相互协同，就需要建设由多个区块链架构组成的系统，然后通过虚拟化的方式将用户系统中的实际需求和业务移植到区块链中来完成。

在整个智慧城市体系中，每一个体系之间都能够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系统建立信任体系，解决因为系统不同源而导致的网络信任和通信协议问题；同时多个彼此独立的区块链之间会根据具体的业务和需求进行架构的合理搭建。

#### （一）智慧城市的区块链架构

智慧城市的区块链架构由三个子系统组合完成，其中包括定制化用户系统，公共智能系统和智能化业务系统。定制化用户系统是专门为用户打造的系统，其主要功能是分析实际需求、定制个性化服务和获取相关信息和服务的系统。对于不同服务商来讲，虽然服务终端是不同的，但是通过区块链特有的分布式系统管理架构和去中心化的数据管理

机制，可以实现不同终端之间通过公共智能化系统进行协同的目标，从而实现打通终端之间的服务，提供定制化服务的解决方案。公共智能系统相当于一个公共的数据端口，任何定制化智能系统都可以通过区块链之间的智能合约和自动化脚本代码实现和公共智能系统的数据交换、数据存储和加密、触发应用自动化运行的目的。同时，公共智能系统作为数据库，受到监管部门和普通大众的监管，做到数据透明化运作；智能化业务系统是业务终端的操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除了可以和直接需求的用户终端对接外，还能够通过公共智能化系统为第三方需求提供服务，做到不需要特定的时间、地方和方式就可以解决用户的需求。

基于以上架构的智慧城市，可以很好的实现跨终端协同运作，从而更好的配置城市资源，避免城市资源浪费，符合国家倡导的节能高效的战略要求。

#### （二）智慧城市的终端智能化配置

在智慧城市体系中，由于各个系统所分配到的任务不同，这就要求负责相应任务的区块链的配置也不相同。如果按照传统的硬件配置规格，每一个系统就需要专门的负责部门来完成定期的资源配置，这样不仅浪费时间精力，也浪费资源。例如，在工业物联网应用的场景中所需要的区块链要求必须采用效率高、速率快的共识机制，而在普通的民用物联网场景中对于区块链的要求就没有这么高，在同一智能系统中如果两者占用资源一样多，势必会造成网络资源、运算资源和存储资源的浪费。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对区块链进行合理的虚拟化。区块链虚拟化就是将现有的区块链进行总结分类，分为数据层、网络层、共识层、账本拓扑层、激励层、隐私层、合约层和应用层这几个层次<sup>[4]</sup>。通过对区块链各层次功能的虚拟化达到将物理资源抽象化的目的，实现了与基础的物理资源分离，将获取的虚拟化资源用于区块链计算。计算和存储以虚拟机的形式存在，虚拟网络则由链接和节点组成。

通过虚拟化区块链的方式将区块链中的每一个

层级在系统中抽象为虚拟模块，以这种虚拟化的方式来参与运算，可以使得区块链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运算效率更高，拓展性也更强。

### （三）公共智能系统的访问权限

智慧城市区块链体系搭建的核心是将区块链作为数据存储和承载的基础。在定制化用户系统和智能化业务系统需要访问数据时，考虑到安全性和隐私性，个体、机构、平台之间的数据共享访问权限是非常必要的。虽然传统的区块链技术本身就已经通过加密算法实现了对存储数据的加密和保护，但是考虑到智慧城市系统对个人数据和隐私的保护，还需要在区块链加密的基础上引入新的数据保护机制，使个人和智能业务系统访问的数据放在保护区内，设置访问权限。

通过最常用的访问权限设置结合区块链密码学加密的方式，能够实现在节点访问区块链数据的过程中既能够保证机构和系统之间在访问数据的过程中读写的安全性，也能避免用户个人数据和非公开类数据在写入过程中被泄露和盗取。而对于可公开的数据，在智能业务系统节点接受到用户请求之后，由智能系统直接共享给业务系统，无须特殊访问权限。

智慧城市的区块链体系通过设置访问权限结合区块链的密码学加密技术，对数据和隐私进行安全保护，是智慧城市区块链体系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 四、智慧城市区块链体系解决的具体问题

通过以上对智慧城市体系的搭建、优化配置和安全性设置，智慧城市体系完成了基本的建设，相对于传统的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能实现分布式、全场景、跨终端的智慧体验。

### （一）助助力智慧医疗，解决健康问题

随着可穿戴设备的普及，健康监测和健康数据实时监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然而目前这些数据被存储在服务提供商的云端数据库中，即便有实时监控的数据，也很难为用户提供及时专业的医疗服务，这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是各个终端之间数

据不能被共享。区块链技术就能很好的解决这样的问题。

利用区块链技术打造用户智能终端，比如智能手表、智能家用医疗器械等等，通过这些设备将已经监测和存储的数据上传到公共智能系统存储。这些数据会根据不同的等级被分成几个部分，分类列入不同的层级当中。

根据不同的医疗服务，智能化业务系统可以分为专业的医疗服务系统和专业的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系统。一方面，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系统可以在公共智能化系统的区块链数据库中读取可公开的健康数据，并作出及时的分析，将分析报告传输到用户终端，让用户及时查看健康信息；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人工智能算法为用户推荐健康的解决方案。通过公共智能系统不断收集和分析数据，对整个城市的人的健康做及时的监测分析，并为医疗服务提供可靠有力的支持，节约公共医疗资源。

对于专业医疗服务体系来讲，区块链体系也可以做到及时调配医疗资源，为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诊疗，解决患者就医困难、医疗资源严重不匹配的问题。每一个医生的基本信息以及从业经验、服务类型、专业领域及专长等等都会被存入到公共智能化系统的区块链数据库中，通过一套人工智能系统和患者求助信息做最充分的匹配。匹配完成后专业医疗服务体系会自动从公共智能系统的数据库中读取相关信息，并通过用户终端通知用户及时查看并就医。相比目前的智慧医疗服务体系，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合理分配医疗资源，避免了目前因为第三方介入和广告推荐而引起的医疗资源浪费等问题。

### （二）助力生产制造，合理分配资源

生产制造行业的资源严重不匹配是目前行业关注的焦点，原因是上游产业链很难掌控下游商品供应链的具体情况，对于供应链的反应和判断总是处于滞后的状态，从而导致生产资料的浪费。互联网大数据在生产制造行业中的应用实现了下游供应商向上游产业链的方向定制，但是下游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资源匹配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区块链技术在行业里的运用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通过对用户终端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在公共智能化系统中建立中央数据库,而各个下游供应商可以通过智能化业务系统匹配到与自己相关的客户需求,对客户做出最精准的判断;同时上游产业链也可以在公共智能化系统的数据库中自动匹配到最有力的资源,从而合理利用资源进行生产制造。

因为区块链的开放性和自治性,使得产业链数据透明化,这对于整个产业的竞争来讲是相当有力的。既把宝贵的资源交给了能够发挥其最大价值的产业和供应商,也为终端用户提供了匹配度最高的产品,使得生产制造也良性发展,为社会节约资源和成本,极大地符合智慧城市的设想。

### (三) 助力城市物联网产业升级

近些年物联网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同质化和中心化,然而物联网发展的趋势一定是去中心化的。不管是嵌入式系统的引入还是平台生态化大战略的规划,对于智慧城市而言,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各家平台和生态的边界没有被完全打破,各个平台和生态所遵从的协议始终不能够被统一,数据安全性始终得不到保障,终端与终端之间始终不能无缝协同,这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始终是一种阻碍。区块链技术的引入便很好的解决了这系列的问题。

首先是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点。去中心化是物联网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传统的物联网是将数据中心化,各家平台都以自己为中心,数据不仅共享困难,而且安全性较低。区块链本身对存储的数据具有加密保护的特质,并且区块链可以通过智能合约自动完成对数据的分享,这对于打造智慧城市物联网生态是极其有利的。

其次是区块链智能合约自动化应用脚本技术,使得不同类别的智能系统之间的边界被打破,使得万物互联的可能性大大提升。同时多个不同终端之间的数据交换也更加智能化,不再被限制在某一个平台中,因此物联网的智能化效率也大大提升。

最后是区块链技术的引入全面提升了物联网服务。智慧城市万物互联时代,以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优价值的服务是智慧城市需要实现的愿景。区块链

技术的发展,升级了物联网底层服务的运作模式,使得服务资源得到了最佳匹配,大大提升了物联网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 五、总结

当前是智慧城市建设构想的关键时期,也是智慧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准备时期。区块链技术的引入从根本上解决了智慧城市的建设与架构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随着物联网、网络通信技术的不断迭代,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会越来越全面,区块链技术也会被运用在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终端设备中,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底层的技术保障和便捷的升级服务。区块链是智慧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也是物联网大数据更新迭代最重要的技术支持。

### 参考文献:

- [1] 黎江,郭小江,谢波. 动物标识及动物产品溯源体系运用与思考[J]. 当代畜牧, 2017(2):18.
- [2] 朱旭东,张磊,胡鹏程,等. 基于RFID紫砂产品溯源认证解决方案 [J]. 电子设计工程, 2016(6):131-133.
- [3] 鲁佛文. 浅谈区块链在物联网领域的应用[J]. 数字化用户, 2018(37).
- [4] 史海建. 区块链原理与应用前瞻 [J]. 中国科技纵横, 2017(10).

[责任编辑:杨琳]

# 普法宣传举措创新及长效机制研究

曹广宇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 法学教研部, 辽宁 大连 116013)

**摘要:** 在“七五”普法收官、“八五”普法谋开局之际, 分析当代普法工作的特性和内在矛盾, 分析现阶段普法宣传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应创新普法举措, 以“互联网+普法”模式为基础, 构建“智慧普法平台”。该平台作为中介桥梁, 可以实现被普法者与普法者的有效对接, 减轻政府普法工作压力, 进而提高普法效率和普法质量, 节约普法成本, 形成长效的普法机制。

**关键词:** 普法宣传; 举措创新; 互联网+; 智慧普法平台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20)11-0058-07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重要部署, 对法治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明确了法治宣传教育的基本定位、重大任务和重要措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 “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 “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

神, 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观念, 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氛围和法治习惯”; 党的十九大提出, 要“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 “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夯实依法治国群众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要求法治宣传教育“要创新宣传形式, 注重宣传实效”, 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基本遵循。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要求相比, 有的地方和部门对法治宣传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 普法宣传教育机制还不够健全, 实效性有待进一步增强。2020年是“七五”普法的收官年, 是普法工作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年, 总结归纳过去三十五年普法的成绩和经验教训, 充分利用“互联网+”, 研究和探索新时期我市普法工作的新对策和新举措, 是我们所有法律工作者共同的期望和使命。

## 一、普法宣传活动的性质和内在矛盾

我国普法宣传活动始于1985年11月5日《中

**收稿日期:** 2020-10-26

**作者简介:** 曹广宇(1985-), 男, 辽宁抚顺人,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大连行政学院、大连市社会主义学院)法学教研部讲师, 法学博士; 研究方向: 法治文化与法治社会。

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普及基本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中发1985[23]号)的文件要求和实施的“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活动,由此“普及法律常识”也简称为“普法”。继“一五”普法之后,我国分别于1991年、1996年、2001年、2006年、2011年连续开展了六个五年为一期的普法历程,2016年进入“七五”普法阶段。“七五”普法,深化了“普法”的内涵、扩大了“普法”的外延,将普法界定为“法治宣传教育”,即向国家居民普及法律知识的过程<sup>[1]</sup>。

### (一) 普法活动的性质

基于对普法活动的研究和普法教学实践,本文将普法活动的性质总结归纳为如下五条。

1. 公益性。普法活动是非营利性和具有社会效益性的活动,它以谋求社会效应为目的,具有受益面广、规模大、持续年限长、影响深远等特点。普法活动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凡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例如司考培训机构为扩大自身知名度进行的法律知识宣讲)都不是普法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非营利性组织才能普法,任何营利性组织只要不以盈利为目的所进行的法律宣传活动都是普法活动(例如律所自筹经费去学校、军队、农村进行普法)。

2. 普及性。普法活动是普及性的教育活动。首先,普法主体可以是任何组织和个人。普法者的身份不存在限制,只要符合我国普法活动的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成为普法者。它既可以由政府发起,也可以由民间组织发起,还可以由个人发起(即便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也可以通过某些形式作为反面教育的典型,参与到普法活动中)。其次,普法客体是国家所有居民。它不以被普法者的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等为界只要在中国生活的人,即便是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也是普法的对象。

3. 知识性。普法活动是以传播法律知识为核心的活动,而不是传授法学理论和法律事务实践理论为核心的活动。普法活动所普及的法律知识具有普

适性、实用性、易学性等特征。普适性意味着普法者在东北地区宣传的法律知识也适用于遥远的西南地区,否则就是不成功的普法;实用性意味着所普及的法律知识对被普法者有实际帮助,例如关于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律知识、“谁主张谁举证”等举证责任知识;易学性意味着被普法者可以即学即用,而较深的法学理论(例如人性恶假定理论)则不属于普法的范畴。

4. 专业性。由于法律是一套庞杂的规范体系,为了适用的方便,法律分为了许多法律部门,所以普法活动带有强烈的专业性色彩,不同的普法者通常只擅长于宣讲某些法律或者某些法治政策或者部分法制史。由于精力和能力所限,普法者不可能做到每部法律都精通、每项法治政策都熟悉、各阶段法制历史都谙熟,所以普法活动需要人手充足、专业齐备的普法队伍,以适应各种普法活动。

5. 与时俱进性。由于法律存在滞后性的特征,即成文的法律永远滞后于时代发展,所以各部法律都在不断地更新和修正、不断地进行相应的法律解释。不仅被普法者更需要获知最新的法律知识和法治政策,而且普法者也需要不断地学习最新的法律和解释以及最新的法治政策。因此,普法活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活动,它没有终点,它始终在与时俱进,“七五”普法结束后,还会有“八五”普法、“九五”普法。

### (二) 普法活动的内在矛盾

由于普法活动存在公益性、普及性、知识性、专业性和与时俱进性等性质,就决定了普法活动存在下述内在矛盾:其一,由于普法活动是公益性活动,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普法主体,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可以参与到普法活动中来。但由于历史和国情原因,政府充当核心角色主导普法的全过程,普法就成为了政府工作而不是社会工作。“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共同参与”是多年以来普法工作坚持领导机制,其优势在于,政府强有力的权力组织实施能力保证了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能够自上而下贯彻执行,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同时政府主导带来了先天的排他性和垄断，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法治宣传当中去<sup>[2]</sup>。

其二，普法活动是普及性的教育活动，目的是让国内尽可能多的居民懂得最新、最全、最有用的法律知识。但是，普及性并不意味着普法活动对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有着相同的普法模式和普法内容，而是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活动。由于普法是公益性而非盈利性活动，致使许多潜在的有普法意愿的人的积极性无法被调动起来，导致普法队伍人手严重不足。由于普法者供不应求，所以普法活动通常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进行，例如大讲堂宣讲新法、制作法治横幅海报、广播宣读法律，导致普法缺少针对性。

其三，普法活动是知识性的教育活动，学习知识是主观性行为，普法活动是客观性行为，普法的整个过程是普法者的法律知识通过普法手段传到被普法者意识中。这个过程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信息衰减，换言之，被普法者所得到的知识通常会小于普法者所要传达的知识，这是知识传递过程的一个基本特点。由于普法形式的单一和无目的性，导致被普法者获取的法律知识与普法者所普及的知识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是35年来普法工作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精力、人力，但是并没有取得与投入相符的普法结果的重要原因。

其四，普法活动是专业性的教育活动，但由于普法队伍人手不足，致使普法工作不能按需分配。许多懂专业知识的普法者却不擅于表达，存在“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货倒不出”的现象，而常年普法、具有娴熟普法经验的普法者，对很多领域的法律知识却只懂皮毛。目前七五普法的普法模式是“谁执法，谁普法”，这一普法责任制有许多优点，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极大缓解了以往普法队伍专业性不足和各部门普法责任交叉的问题。

其五，普法活动是与时俱进的教育活动，需要普法者自身不断学习，但由于普法通常是一项业余

活动，普法者精力和能力有限，所以对于新形势下的法治政策和新法律法规并不熟悉，导致普法效果有所弱化。

## 二、现阶段普法宣传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市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许许多多普法工作者的无私付出和不懈坚持下，取得了非常优秀的业绩。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到深入宣传，法治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广泛开展，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不断深化，领导干部的学法用法工作水平不断提升，各级公务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的自觉性大幅提高，农民和青少年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但是在成绩背后，依然存在一些各地都存在的普遍性的问题。

### （一）现阶段普法宣传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阵风”现象。目前由于欠缺针对普法宣传的专门性的法律规范，致使普法活动缺少法律遵循，加上普法活动是政府工作而非社会工作的性质，致使普法活动呈现出运动式普法、阵地战普法、间歇性普法、活动式普法等多样态现象，始终无法形成常态化和制度化的普法模式，像来去一阵风，紧锣密鼓一阵子很快就偃旗息鼓。这种现象越往基层、越往农村越明显。

有的单位为了完成普法任务，就是发个文、开个会、粘个报、写个总结，有的单位就是发些材料、看个普法教育片。这些手段和方式无可厚非，确实属于普法的形式，但是问题是这些手段并未形成常态化的机制，“随风来、随风走”，并没有使被普法者充分地了解法治政策和法律知识，并没有卓有成效地提高普法者的法治思维能力和法治素养，并没有让被普法者沐浴在法治文化的气氛之中。

在村镇，由于普法者的角色多数由村干部担

任,而这些干部本身工作压力大、任务重,绝大多数精力为许多更为重要的中心工作所占用,所以普法任务通常草草了事或者没有完成,而上级主管部门也比较“通情达理”,较少考核村干部们所承担普法工作,致使农村的普法形式主义非常严重<sup>[3]</sup>。

2. “鸡同鸭讲”现象。这个问题是各地普法工作普遍存在的顽疾。所谓“鸡同鸭讲”,是说普法者所普及的法律知识并非被普法者所需,对于被普法者所需求的法律知识,普法者要么并不熟悉,要么普法者无法获知被普法者需要哪些法律知识。

被普法者的需求与普法者的所长无法有效地对接,致使很多普法工作看似进展得轰轰烈烈,但却实无成效。这个问题在校园普法中较为常见。由于普法者与被普法者年龄差距大,而且作为被普法者的学生受限于课堂气氛,不愿意主动反馈自身需求,普法者往往难以捕捉被普法者的兴趣,只能按照校方指定的题目来宣讲。据笔者了解,目前中学生最好奇、最想了解的是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若干法律规定和现实案例,但目前校园普法还是以宪法和刑法为主。

在农村,村干部为了能够尽快完成普法的任务,在开展组织学习的时候十分随意,只是简单地在照着书念,学习的人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只会觉得枯燥无比,甚至听不懂。使得大多数农村居民对普法教育提不起兴趣。

3. 成本倒支现象。社会性的普法活动中,普法者有一种微妙的心态值得注意,就是很多普法者(包括有潜在普法愿望的普法者)愿意付出知识成本和时间成本等隐性成本,但不愿意付出通勤费、普法材料印刷费等显性成本,这种“不愿倒搭钱”的问题对普法工作造成了一定阻力。由于普法活动是公益活动,如果长期坚持普法而没有合理补贴,尤其是到距离较远的地区的交通费用,会使普法者额外承担付出较多的开支,削减积极性,造成其难以长期坚持普法工作,还会使一些有潜在普法意愿的普法者难以涌现,这是造成普法人手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4. “不接地气”现象。目前普法宣传方式方法还是较为死板,墨守成规,不接地气。很多地区普法宣传方式还停留在简单的挂条幅、贴标语、发传单等传统的方法上,脱离实际,不能够根据基层和农村发展的现状与时俱进。在法治宣传中宣传内容多以单一的法条和法律解释为主,内容死板生硬,不易理解也不易接受,且与部分人的实际生活关系不大,无法让广大居民产生兴趣。

此外,这种现象在电视节目中较为常见。从央视到地方的各普法栏目中,许多案件虽是基于真实事件改编,但为了使剧情更具吸引力,节目的演绎也出现了表演浮夸、用力过猛、太过戏剧化等问题。内容常以刑法为主,基本都是对诈骗、故意伤害人、强奸以及非法拘禁等犯罪进行重复演绎,涉及其他法律的内容较少。

5. 专业普法队伍组织难。普法队伍人手不足是目前普法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难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领导队伍中专业法律人才占比较低,无法起到普法带队作用;其二,农村和基层工作非常艰苦,难以吸引法律人才,同时农村和部分基层地区离市区距离较远,在没有足够普法补贴的情况下,很多普法者不愿意自担通勤成本和时间成本;其三,普法志愿者人数虽然多于实际普法者,但实际普法活动中难以将这些潜在的普法志愿者有效地挖掘出来和组织起来,一是因为普法工作的阵风现象,没有形成常态化工作,二是无法通畅快捷地联系普法志愿者,三是联系到合适该普法活动的普法志愿者需要消耗较大的精力。以笔者为例,目前参与的社会普法主要是单位组织的“送教下基层”活动,虽然很想去学校、去企业、去社区普法,但没有一个有效的普法平台或运行机制,使自己难以参与其中。

#### (二) 现阶段普法宣传实践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 普法活动的内在矛盾决定了问题的存在。前文已经分析出,普法活动天然存在了诸多内在矛盾,这就决定了普法实践一定会存在问题。只能说这些问题严重的程度会随着时代进步而有所减少,

但不意味着会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普法活动与其他法治建设活动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的过程，可以说“普法永远在路上”。

2. 被普法者主动性不高。部分普法者错误地将普法活动当作一项“任务”，只要完成上面布置的任务就好，较少地去考虑普法目标是否精准，被普法者是否需要这些法律知识。由于缺少可以与被普法者公开对话的平台，在灌输式的普法模式下，被普法者的需求难以得到反馈，只能被动接受，日久疲惫，对普法活动缺少关心。此外，普法内容主要是法律知识和法治政策的宣讲，部门内容与被普法者离得较远，容易使被普法者认为法律仅仅是“解决纠纷、保护权益”的工具，这就容易使被普法者养成法律工具主义倾向，培养了乐于钻法律空子的人。

3. 普法工作评估体系失衡。目前普法工作评估针对的是肩负普法职责的执法者做了哪些普法任务，对于普法的社会效益，即在评估体系中有社会满意度测评内容的权重占比较低。简而言之，评估的内容多是“我们做了什么”，少有“群众得到了什么”。有学者在关于几个县（市、区）普法工作的总结和汇报材料调研过程中发现，均没有文件涉及群众满意度测评<sup>[4]</sup>。

4. 普法活动形式未能与时俱进。现阶段，在市区内的普法活动形式算得上比较多样和新颖，尤其是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在普法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基层尤其在农村的普法活动还是传统的普法模式。新法律法规出台了，普法工作有声有色地忙一阵子，等热度过去，普法工作又进入睡眠期<sup>[5]</sup>。由于法律知识必须结合具体实务和实践才能深入被普法者的灵魂，所以没有结合被普法者具体需求的“间歇式普法”，普法效果大打折扣。

### 三、普法举措创新：构建“智慧普法平台”

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并形成稳定、有针对

性的长效普法机制，建议在市级党委政法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互联网+”模式的积极作用，以司法局为主体，发挥法学会的群团作用，建立市级的“智慧普法平台”。

#### （一）智慧普法平台的结构模型

该智慧平台由市委政法委（或依法治市领导小组）牵头，由司法局作为主办单位，以“网站+公众号”形式进行建构。被普法者可在平台中提出具体的普法要求，平台经过数据分析后向最符合要求的普法者发出要约（此过程需要先经过司法局调配），普法者收到要约后与被普法者约定普法内容、时间、地点等事项，被普法者与普法者达成一致后即进行普法活动，完成普法活动后向平台进行活动反馈。模型图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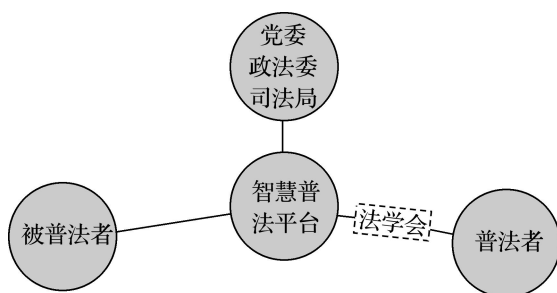


图1

#### （二）智慧普法平台的具体内容

在该平台下，普法活动由被普法者发起（例如点击“我需法”按钮，按要求填写具体事项），然后会经由系统大数据和相关机构的审核发给适合此活动的普法者，普法者收到普法活动信息后，即与被普法者取得联系并沟通具体事项，接着便开展普法活动，完成普法活动后双方在平台内进行回馈，平台将数据收集汇总后进入我市普法数据库。打个比方，该平台运转机制像购物平台，智慧普法平台是购物网APP，被普法者是“买家”，普法者是“卖家”，党委、政法委、司法局是购物网站的所属公司。

智慧普法平台有三个向度的内容：首先，平台

必须由政府负责建设，不能交给社会。原因有三，一是这样才能保证所普及的“法”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法律法规，而不夹带西方“宪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思想以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思潮；二是政府财力有保障，能保证平台的长期平稳高效地运行；三是普法活动的数据可以进入普法数据库和我市综治信息平台数据库，政府可以对普法的需求、对象、内容等信息和频率进行梳理和归纳，掌握普法“行情”，进而开展更为有针对性的普法活动。

其次，该平台的最大特色是有效对接了被普法者，并以被普法者为发动方。被普法者必须实名注册，在登录公众号后，可以提出具体的普法需求，并上传附有若干人以上签名可参加该活动的普法需求的照片（因为目前的普法队伍数量难以应对单人普法）。上传后，平台公号进行审阅，审阅通过后，平台系统根据普法者所登记的个人信息和评价综合先选定若干名普法者进入候选区，然后平台端里的司法局或法学会的负责同志所对应的模块会进行高亮和音效提醒，由其选定其中的部分普法者并进行推送，对应的普法者收到信息后与被普法者取得联系。同时被普法者要注意时间，普法需求提出日与实际普法日相差至少7个工作日，以方便普法者安排时间并准备普法内容。

第三，普法者须在平台实名登记，一是表达自己的普法志愿，二是登记自己擅长于讲解哪些法律或哪些法治政策的（可每季度修改一次），三是登记自己的可以进行普法的时间和活动区域。普法平台经过数据分析判断出最适合的普法者名单，由司法局和法学会的该模块负责人（司法局和法学会可以协调谁来负责此事项）进行审定（或者通过司法局和法学会的该模块负责人的个人了解普法者个人信息），通知普法者进行普法。普法者收到信息后，勾选普法承诺书，与被普法者约定时间、地点以及需要被普法者提供的材料和道具。进行普法活动后，普法者与被普法者在平台进行确认，并自由填写普法反馈意见。

### （三）智慧普法平台的建设难点

其一，智慧普法平台背后的协调统筹有难度。智慧普法平台本身的构建并不难，只需要招标给一个软件公司或者工作室就能完成。但是，司法局在百忙之中，如何抽出一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主推构建这样一个非中心工作的网络平台，需要进行综合协调和部署。

其二，前期宣传推广有难度。这个是该平台建设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大多数人们于新事物都怠于接受，就需要有关方面来大力推广该项目。第一，“谁来推广”这是难中之难，凭空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但是现有体制不会给予其相应的“报酬”，这样负责推广的同志就会缺少足够的动力。其二，需要负责推广的同志先联系一定数量的普法志愿者，分别去有普法职责的单位（《2019年市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清单》）和高校、党校、科研院所等部门登记普法志愿者。其三，需要在我市各大媒体、公众号平台进行推广宣传，让全市居民注册公众号平台，重点让各中小学、各社区先行注册。当然智慧普法平台的推广不应当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被普法者与普法者注册的数量要始终保持适当的比例。当普及到一定程度后，被普法者之间会互相推广。换言之，前期是艰难的，一旦运行起来就会非常轻松。

其三，后续的维持有一定难度。一般来说，一个平台能做到长期维持要么是负责解决问题的平台（类似民生网）、要么是营利性平台。本平台以增进社会福祉为目的，非解决问题为导向，也不以盈利为目的，想做到长期运转就需要党委、政法委和司法局对普法工作的充分重视以及把平台运行后产生的良好效益作为一项民生政绩。

### （四）智慧普法平台的特色和作用

智慧普法平台是“互联网+法治宣传”的具体应用，是构建多元、互动、服务、参与型法治宣传模式的一项有力举措。目前各地尚没有建设此种智慧普法平台，目前已设立的智慧普法平台仅为中国普法网的“智慧普法平台”，该平台并非“智慧”

的平台，它不以对接普法者和被普法者为目的，是以建设法治文化、推进法治化社会治理为目的的普法平台。

智慧普法平台对于克服长期以来存在的普法顽疾有较大作用，体现在：其一，智慧普法平台使普法活动形成常态化和制度化的长效机制。智慧普法平台的普法驱动者是被普法者，运作机制较为市场化，这可以与政府为驱动者的活动式普法形成互补，进而形成稳定长效的普法机制。被普法者是普法活动的主动发起方，主动学习知识的学习效果要远好于被动接受知识。被普法者可以通过平台向普法者提出关于普法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例如被普法者的需求就是希望普法者制作一些普法宣传海报，那么这就可以显著降低以前普法者自主地制作宣传海报而造成的被普法者的“不感兴趣”的情绪，这里面的“你情我愿”是解决普法困境的有力武器。另外由于平台下的普法是比较“市场化”的，普法需求交给了市场，这样就把普法工作从政府主导性的工作转向为社会工作，会极大释放普法的活力。

其二，智慧普法平台可以有效解决“鸡同鸭讲”现象。由于智慧普法平台的驱动者是被普法者，所以被普法者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普法需求，平台通过数据分析，选择最适合该普法任务的普法者，这样被普法者和普法者可以有效地对接，被普法者的需求可以充分得到满足，普法者也可以进行有的放矢的准备。虽然该平台并不能覆盖所有的普法任务，但是能极大地提高普法质量。另外，智慧普法平台将过去传统的单向信息灌输模式，转化为现在的平等的双向交互模式，使普法者和被普法者在对话中成为了独立的法律思维个体，共同成为法治文化建设主体。

其三，智慧普法平台可以通过其中介性质，实现被普法者为普法者提供一定的出行补贴，普法者可以跟被普法者提出一些关于道具、设施、材料制作等相关要求，做到透明普法、快乐普法、安心普法。同时平台经过数据统计，通过司法局和法学会，给予那些参加普法活动多、普法质量高、普法

评价好的普法者一定的物质奖励或名誉奖励，增加普法者的积极性。

其四，智慧普法平台对于组织专业普法队伍、挖掘潜在的普法志愿者，有着极强的作用。由于以往普法活动中，普法者通常是组织发起者本人或者其熟悉的人，普法人手不足。但智慧普法平台中，很多普法者是公民或者组织，是自愿注册的，许多潜在的普法志愿者也被挖掘出来，极大地扩充了普法队伍，丰富了普法梯队。

其五，构建智慧普法平台是一笔“划算帐”。虽然前期需要一定的平台建设开发成本，但一旦运行起来，其节省的行政成本远大于研发和运行成本。不仅可以大幅减轻了政府各部门在普法工作中的工作量，同时可以将普法大数据反馈给各方，例如电视台、综治中心，进而形成普法良性循环。

#### 参考文献：

- [1]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6-04/18/c\\_135287706.htm](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6-04/18/c_135287706.htm).
- [2] 杭天. Y市基层政府普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扬州大学, 2018.
- [3] 付子堂, 肖武. 普法的逻辑展开——基于30年普法活动的反思与展望[J]. 社会科学战线, 2017(6).
- [4] 张武林. 创新江苏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司法, 2018(2).
- [5] 曹广宇. 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对策与思考[J]. 大连干部学刊, 2018(8).

[责任编辑：姜卉]